

研讨实录

第 138 期

138

周天勇：2035 年远景目标和重大改革及其发展举措
座谈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应对
包道格：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马骏：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一年五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胡旭照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四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本基金会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 163 期上海发展沙龙，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先生作了题为“2035 年远景目标和重大改革及其发展举措”的演讲，并回答了嘉宾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历史上三次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是来自改革。若无重大改革发展安排，2035 年经济翻一番不可能实现。改革的重点是资本、土地、人口要素市场化。他和实验室团队的研究结论是：一要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 0.41%、0.31% 和 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 1.11%。总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年均为 3.05% 或 3.6%。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 1% 左右。三是调水改土。

如果我国能够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 1000-1500 亿立方米，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增加土地 1.5 亿亩建设用地、0.5 亿亩园地和 5 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0.5% 左右。总之，要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增长潜能。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本基金会于 4 月 8 日共同举办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应对”座谈会。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顾问胡华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了会议，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有专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基本成形，目标也基本定下了，就是动用它一切可能利用的有利的手段，形成一个广泛的西方国家联盟，来对中国形成包围或压制，以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有专家认为，要特别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的周期，如果一个新时代被拜登开启，后面就是几十年新方向的发展，这对中美关系以及跟中国竞争等等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机会增长、绿色经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等都是一盘棋，要放在一起研究。不能简单地看待其对华战略、全球战略，要

将其国内国际连起来看，气候政策、安全政策、贸易政策都是相连的。

本基金委会于4月13日以视频的方式举办了第63期系列座谈会。我们邀请了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H. Paal）先生和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先生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一议题进行对话，随后有多位嘉宾参与了对话。包道格先生认为，拜登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塑造了这种环境，这是拜登必须应对的环境。尽管拜登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参议院和副总统职位上负责外交事务，但他是个受国内利益驱使的人。特朗普实行的一系列政策给拜登造成了许多限制，但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他仍将努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并考虑国内问题的结果。他很早就宣布，他将花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审查中国政策。首先，这让他可以避免共和党人的批评。第二，这给了他时间，评估在制定自己的中国政策方面的机会和风险。现在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评估期。他还认为，拜登的人不会玩利用台湾对抗中国的游戏。他们明白

那是一张不确定的牌，不是一张有价值的牌。他们只是试图加强与台湾传统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希望台湾人民明白这不是特朗普政府。

本基金委会于4月18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164期上海发展沙龙，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高级顾问马骏先生作了题为“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的演讲。他指出，今后30年为了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新增投资的区间在100万亿到500万亿之间。这些投资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现有的低碳零碳技术进行广泛的应用。第二类投资是用于研发和完善更多的绿色低碳和零碳的技术。金融机构必须通过多方面努力使自身更加“绿色”。首先，金融机构需要更加绿色的公司治理。第二，要形成量化的战略目标。第三，必须要有跟ESG相适应的流程。第四，要以环境信息披露有效管理棕色资产风险和自身碳排放。第五，加快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第六，充分利用激励机制和混合融资。最后，金融机构要实现自身运营的碳中和。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目 录

周天勇：2035年远景目标和重大改革及其发展举措	1
座谈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应对	41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98
马 骏：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	122

2035 年远景目标和重大改革及其发展举措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3 期 2021 年 3 月 1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上海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在线上召开此次沙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是我们 2021 年第一次召开沙龙，去年由于疫情暴发，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线下搞沙龙。今年年初，本地又出现了新的疫情，又加上春节，所以就拖到现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到了周天勇教授为我们作主旨演讲。周教授原来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退居二线以后到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任主任。周教授是我们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老朋友，此前的沙龙也请他来做过演

讲。2019 年我们和上海财大的专家们召开关于户籍和城市化的小型研讨会，周教授也出席了。我看他最近在网上也比较活跃，发表了很多观点，分享了很多消息。我们刚刚召开的两会不仅审议通过了 2021 年的计划，也审议了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规划的纲要。今天我们就请周教授给大家演讲，大家欢迎。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大家好，今天我想讲的内容是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的远景目标。总书记在建议说明中提到：2035 年实现 GDP 总量以及人均 GDP 翻一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两会结束后，总书记的讲话会印出来，成文的远景目标将如何表述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估计还是这个说法。我们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团队的研究方向有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就是替当期或未来两三年短期的经济做分析和预测。第二个板块是研究哪些改革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两会之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没有重大的体制改革安排和重大的发展战略安排，我们很可能达不到 2035

发展目标。今天，我就把我们团队近两年的研究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主要讲六个部分。第一，如果没有改革发展安排的话，2035 年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第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可能有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模糊认识。第三，要素深化改革的学理讨论，以及对未来增长的计算。第四，我们提了一个比较大的政策建议，即调水改土，增加土地。第五，如果需求不振，即使有很大的增长潜能，需求的边界仍然无法扩张。第六，金融安全，如果货币没有信用的保障和发行之锚，很有可能像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货币一般容易贬值，进而导致人均 GDP 急剧萎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无重大改革发展安排，2035 年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国 2020 年 GDP 总量 101.60 万亿元人民币，2035 总量番一翻为 203.21 万亿；2020 年人均 GDP 为 72442 元人民币，翻一番为人均 144896 元；以不变价计算，未来 15 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 4.73%。我们这几年研究不同经济体制国家

的经济发展，发现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转轨国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像我们这种渐进改革的国家，改革进程已持续了几十年，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另一种是瞬时转轨国家，比如像俄罗斯、东欧这些国家。此外，朝鲜、古巴都不转轨。越南转轨的幅度比较大，我们是很缓慢地在转轨。这种长周期渐进式转轨国家，是用改革来安排自身的发展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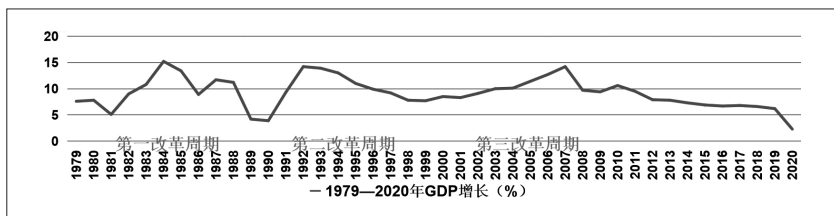


图 1：改革周期与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等改革一下子推上来以后，后来出现了治理整顿，经济增速就下来了，但下来以后又立刻反弹上去了，此后的回调趋势一直持续到 89 年。第二个阶段，92 年经济增速达到 14% 的顶峰，随后又回落。这个阶段大家都很熟悉

了，南巡讲话，个体私营经济，确定要向市场经济转向等等，力度非常大。特别是外资，涉及港商、台商，新加坡的资金，还有日韩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 WTO 的影响，经济增速一度跌到 6% 的水平，后来回升，一直到 2007 年的 14.2%。第三个周期爬坡的周期比较长，第一个周期爬坡的周期比较短，第二次更短但是增长率比较高，第三次爬坡，一直爬到 07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08 年经济增速就下来了。2010 年一直到现在，经济增速都在下行。实际上，这三次大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由非常大力度的改革推动的，都是间歇性质的，是改革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改革安排，或者改革不落实的话，才算是自然经济增长。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篇比较有名的文章（巴里·埃肯格林朴东炫申宽浩：“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国际证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比较，2012 年第 2 期）提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什么时候减速，他们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最大可能出现在人均 GDP

达到 16740 美元时。高速增长一般指的时经济增速 8% 以上。其实 2012 年的时候，我们在人均 GDP 仅为 6100 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速已经从 8% 的速度上跌下来了。巴罗是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他认为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来拉动未来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 8% 回落到 3-4%。黄泰岩和张仲认为，如果改革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悲观情形下，中国 2021-2025 年、2026-2030 年和 2031-2035 年潜在增长率甚至更低，分别为 1.52%、1.82% 和 2.00%。

研究经济增长主要涉及这么原理。第一个原理就是劳动力，即投入生产的劳动力，有可能从目前的 7.6 亿下降到 6 亿，劳动力供给每年年均负增长 1.08%。第二个原理是关于资本要素如何增长。去年、前年和大前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低了，去年是负数，前年也是负数。这种情况下，投资怎么增长？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速在 7% 到 4%，稳健的估计是 6% 到 3%，悲观的话可能就在 5% 到 2%。这种情况下，按这个增长模型计算，

投资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高水平是 2.85%，中间水平为 2.35%，低水平则仅为 1.84%。广义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力增长部分，我们认为在没有大的改革安排下，仅为 1%。这种状况下，它的高中低三个增长水平分别为 3.31%、2.5%，1.81%，肯定不能满足计划要求，即使按最高的一档经济增速增长，也实现不了目标。

	最后 GDP8% 增长年份	8%增长以前时 间	人均 GDP	人口生育 率（个）	人口自然 增长率‰	65岁以上 人口比例
韩国	2002	1960—2002 42年	12094	1.17	3.5	7.0%
台湾	1997	1950—1997 48年	14048	1.70	9.0	8.0%
大陆	2011	1979—2011 33年	5447	1.04	4.8	9.1%

图 2：大陆韩台国家和地区 8% 经济增长率
年份各项指标的对比

我国人口是不是未富先老？我们观测了经济增速跌破 8% 以前的时间长度，韩国是 1960 年到 2002 年间的 42 年，跌下来这一年，人均 GDP 为 12000 美元；台湾是 1950 年到 1998 年间的 48 年，跌下来这一年，人均 GDP 为 14000 美元。我们经

济增速跌破 8% 是在 2011 年，高速增长时间达 33 年，人均 GDP 仅为 5447 美元。从人口生育率角度，韩国跌下来时是 1.17，台湾是 1.7，我们大陆是 1.04。65 岁以上的人口，韩国跌下来时是 7%，中国台湾是 8%，我们已经 9.1% 了。我们观察了人口自然增长与 GDP 增长，要滞后 20 年，为什么滞后 20 年呢？从生产角度来看，新增人口在 20 年以后会大量地参加工作；从消费角度来看，有了收入就要花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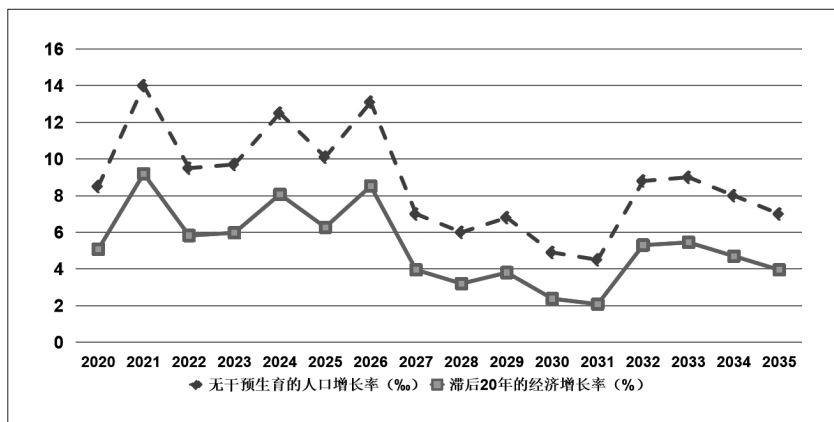


图 3：假设没有实施过计划生育的未来增长速度

所以我们就滞后 20 年进行了回归。我们按照这个模型推算，假定当时没有实施计划生育，经济增长如图 3 所示，按这个速度，我们经济在 2035

年再翻一番甚至还有更多。实施了计划生育增长，就是刚才的模型，经济增长率将跌到 2% 到 3% 的区间里。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增速将一直往下走，将降至 2% 附近，这与我们刚才用生产法算的经济增长数据吻合。这就是说，我们从生产投入产出法的增长模型和人口回归两种测算，都是这个数据。我们算了以后，很悲观。

时期	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GDP	TFP	GDP	TFP	GDP	TFP	GDP	TFP
1970~1975	2.7	0.7 (28)	4.4	-0.6 /-14	9.3	1.1 (12)	5.7	0.5 (8)
1975~1980	3.6	0.6 (17)	4.3	0.5 (12)	7.3	-1.4 /-19	6.3	1.2 (19)
1980~1985	3.2	1.2 (36)	4.2	1.7 (40)	8.5	3.0 (35)	10.2	4.3 (43)
1985~1990	3.2	0.6 (20)	4.9	2.1 (42)	9.7	3.2 (33)	7.6	0.9 (12)
1990~1995	2.5	0.8 (34)	1.7	0.0 (1)	7.4	1.7 (23)	11.6	7.1 (61)
1995~2000	4.2	1.5 (35)	0.8	0.3 (30)	4.9	1.6 (32)	8.3	3.1 (38)
2000~2005	2.4	1.1 (46)	1.2	0.8 (66)	4.5	1.7 (38)	9.3	3.9 (42)
2005~2010	0.7	0.2 (36)	0.3	0.6 (167)	3.9	2.5 (63)	10.6	4.2 (39)
2010~2012	2.3	1.0 (45)	0.5	0.6 (116)	2.7	0.4 (16)	8.1	2.1 (26)
1970~2012	2.8	0.9 (31)	2.6	0.7 (25)	6.7	1.6 (24)	8.7	3.1 (36)

注：(1)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生产率数据年报 2014》(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4)整理而得；(2)GDP 列代表 GDP 增速，TFP 列前后两个数字分别代表 TFP 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度。

图 4：1997-2012 年中美日韩四国 GDP 增长率
及 TFP 贡献率（单位 %）

经济速度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挽救回来？中国好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现在要用人力资本红利、技

术进步红利等，要重视创新红利。国外经济学家巴罗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在技术进步方面下功夫。巴罗的研究方向为新增长经济学，他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在技术进步产业创新这些方面实现突破。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要在创新、技术进步、数字经济这些方面下功夫。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历史数据的计算，把中国过去大概 3% 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三分之一来自于改革。第一，如果不改革，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两个时期的贡献率甚至变成负数。2012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是负的。第二，图 4 是中美日韩四国 GDP 增长及 TFP 贡献的表，时间跨度为 1970 年到 2012 年。这 42 年期间，美国的 TFP 贡献只有 0.9，日本只有 0.7，韩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 TFP 贡献率是 1.6。我国 70 年代初 TFP 贡献度很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改革是从 79 年开始的，TFP 贡献率在 80 年到 85 年间很高，达到 4.3%。90 年到 95 年，更是达到了 7.1%。我国加入 WTO 后 TFP 贡献率也很高。42 年中 TFP 年平均贡献率为 3.1%。

TFP 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英文缩写。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中，计算经济增长中说不明白的一部分，它既不是劳动带来的，也不是资本带来的，最后全部归到技术进步中去。但体制转轨国家的 TFP，是技术进步来的吗？这是个关键问题。有改革的时候全要素增长率就高，一不改革就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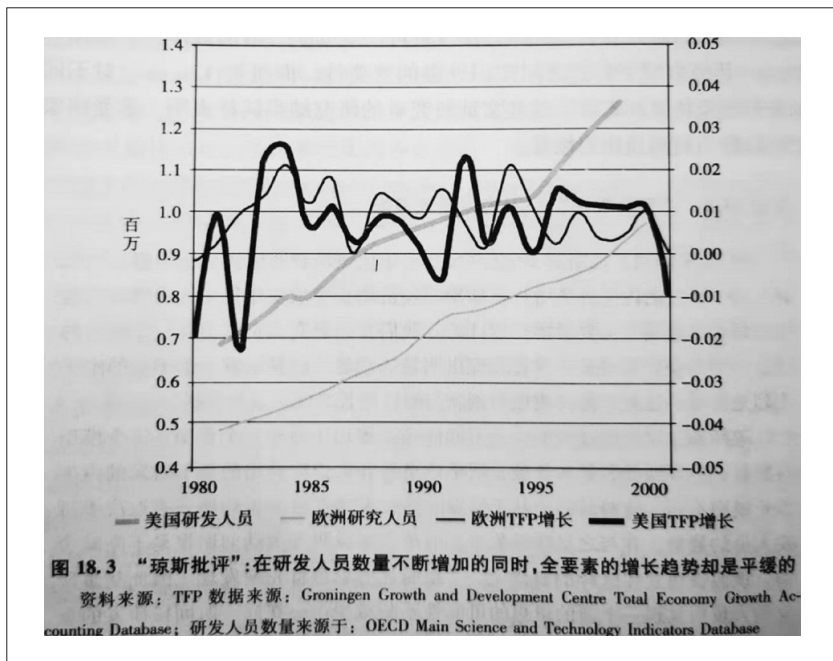


图 5：欧美研发人员数量 & 全要素增长率

图 5 中描述了 1980 年到 2000 年美国 and 欧洲研发人员投入的增长和全素生产率的增长，TFP 增

长率的拟合曲线也是一条平行线，当然它超过 1% 了。研发人员增长率在 1% 之间，美欧的长期趋势也是平行的。长期来看，投入是往上走的，无论是专利数量也好，还是研发人员数量。但是它的 TFP 增长率是平的。我们在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时发现，如果不改革，TFP 长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全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物。而且现在很多技术，比如网络技术、虚拟经济，不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制造业繁荣。所以现在这个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发展很快，有人认为工业化结束了。但是工业化真的结束了吗？经济学家鲍莫尔发现，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越高，增长速度越慢；服务业多是劳动密集产业，是非标准、小规模、非专业化生产，劳动成本较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制造业是资本密集产业，标准化、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数据看，服务业比例上升，但速度放慢。

年份	中国 (%)			年份	日本 (%)			年份	韩国 (%)		
	工业比例	服务业比例	经济增长速度		工业比例	服务业比例	经济增长速度		工业比例	服务业比例	经济增长速度
2005	47.02	41.34	11.39	1969	43.11	51.95	12.48	2000	34.76	51.62	9.06
2010	46.5	44.18	10.64	1975	38.7	56.8	3.09	2005	34.15	53.88	4.31
2015	40.84	50.77	7.04	1980	38.35	58.62	2.82	2010	34.12	54.7	6.8
2019	38.97	53.92	6.1	1990	37.36	60.55	4.89	2015	34.15	55.58	2.81
2020	37.8	54.5	2.3	1995	34.41	63.19	2.74	2019	32.83	57.08	2.04

图 6：中日韩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图 6 中显示了中日韩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2005 年中国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是 41%，经济增长速度为 11.39%；2015 年经济增长速度下跌到 7%，而服务业行业占比却上升到了 43，54%。当然 2020 年 2.3% 的经济增速是一个特殊情况，如果去年未发生疫情，我们估计经济增速在 5.9% 左右。不难看出服务业的结构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下降了。日本、韩国的情况大致相同。

我们工业化尚未结束。图 7 描述了我们农村和城市居民对工业品消费需求弹性的差异，农村要比城市高得多，其实就是农村居民正在进行工业化，享受工业品。以城市来看，工业制成品市场好像饱

和了，但是农村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口，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好像觉得人口和经济增长无关，而且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人口减少不是挺好的嘛。第一，机器人可以进行智能制造。第二，劳动力总量下降后就业压力也将得到缓解。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机器可以进行智能制造，但总要有人去消费。要么出口，当出口受阻，又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去消费，经济就不能增长。特别是老龄化加剧后，消费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我们发现人越多的地方，就业机会也越多。东北生育率降到 0.6%，就业机会也在萎缩。第三是中国经济学中的核算问题，绝大部分学者都使用新古典学派的索洛模型，它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投入的要素中没有土地要素。这个模型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以此方法所做出的分析看不到改革的因素。有些学者不假思索地用这个办法，计算一通以后，写几条改革建议，但在学理上不对应，改革就成定性的猜测了。很多人说，户籍制度变革可能使经济增长 2%。我做过这个方面的核算，因为没有方法，无据可依，心中无数，

无法找到改革的重点是哪些。

年份	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收入需求弹性			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摩托车收入需求弹性			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洗衣机收入需求弹性		
	农村	城镇	农村/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城镇
2014	0.99	1.70	0.58	0.95	1.98	0.48	0.45	0.29	1.55
2015	2.35	2.05	1.15	(0.02)	(0.90)	0.02	0.60	0.22	2.78
2016	3.74	2.36	1.58	(0.43)	(1.02)	0.42	0.80	0.27	3.02
2017	1.26	0.68	1.85	(0.18)	(0.06)	3.07	0.32	0.19	1.65
2018	1.76	1.19	1.48	(1.18)	(0.80)	1.48	0.30	0.26	1.12
2019	1.12	0.66	1.70	(0.42)	(0.51)	0.83	0.35	0.20	1.82

图 7：城乡耐用品收入需求弹性差异

我们逻辑上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瞬时转轨的国家，它经历了从一元计划向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个阶段，通过价格双轨制、市场双轨制进行转变。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二元体制是指计划与市场体制并存，不是产品买卖市场化就算市场化了，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例如资本要素市场现在就存在歧视性信贷等问题。劳动力市场虽然放开了，农村劳动力可以到城里工作，但是户籍制度、子女教育、土地要素根本就没有市场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要素市场上进行并轨。二元体制必然产生体制扭曲，这类体制扭曲有的是可纠正的。比如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土地无法交易，但

是可以通过转移使用权进行生产，以产品市场化实现土地要素收益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如果土地是指标控制，规划用途受到管制，附着物甚至会被归类为违章建筑而被强行拆除，这种情形下便没有办法纠正。我们发现非瞬时转轨国家的增长，要周期性地释放这种扭曲。比如国有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本来是 5 个人的投入，现在只需要 3 个人就可以生产原来 5 个人的量，投入没变，产量却很快增加了。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体制扭曲值和市场竞争值之间的差额。

第一是资本要素体制扭曲差。2020 年，竞争性民营企业得到的信贷资本利息率是 8%，垄断性国有企业得到的利率是 4.5%；全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为 6%，而国有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和权益资产净利润率分别只有 1.01% 和 1.64%，这就是差距。

第二是土地城乡要素价格彻底扭曲。土地要素由地方行政性垄断市场出让的价格 2020 年为 220/亩元左右，而农村的土地因为禁止交易价格为零。

第三是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及收入差。和墨西

哥、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作横向的比较，同样发展阶段，同样人均 GDP 阶段，他们的 2019 年城市化水平是 75%，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比例是 12%。而我们目前城市化水平却分别是 44.3%（户籍）和 60%（常住），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是 25%。劳动力要素价格随着市场竞争场景下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业就业劳动力者收入、外出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应当是逐步接近；但在中国三者却从改革开放初的 50 : 150 : 100 则拉大为 2019 年的 5 : 50 : 100；在这样大的压力差下，外出农民工同比增长率则从 2010 年 5.52% 下降到了 2019 年的 0.92%。

我们的逻辑思路，就是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标准值，转轨国家有体制扭曲差值。从观察来看，转轨国家对照标准存在着“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不应该有那么多，但是多得多；应该有，但是没有；不应该有，但是有”等相关指标的差距值。认为要素价格、要素剩余、要素盘活投入是建立起改革与增长关系的基础。形成将体制性剩余要素代

入回归古典的增长模型。我们现在使用编程软件，大概 5 月份，全部数据都能计算出来。

刘易斯认为，如果城市工资是 100%，农民工的工资是 50%，之后两者会逐渐靠近。农民从事农业，逐步通过农业现代化，农业土地集中，也向前两者靠近。三者工资都靠近以后，二元结构就转型完成了，这是刘易斯工资模型。但是中国是倒着的，初始，农民工工资是城市工资的 150%，现在变成了城市工资的 50%，这就成了刘易斯悖论，用二元结构经济学是解释不通的，只能从二元体制扭曲来解释，将发展经济学和体制转轨经济学同时使用，才能说明这个现象，体制剩余是这么发现的。

数量及比例	劳动力 (万人)	资本 (亿元)	农村宅地 (万亩)	农村其他建 设用地 (万亩)	工矿及城市 建设用地 (万亩)	城镇住宅 (万平方米)
2020年存量	77271	4878443	16989	12513	20883	3716910
体制性剩余	18702	845922	8641	2503	4045	702496
剩余比率	24.20%	17.34%	50.86%	20.00%	19.37%	18.9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自然资源部、城乡住宅与建设部、课题组整理计算。

图 8：2020 年农村及城镇闲置低利用

—即体制性剩余要素数量

我们也计算了体制剩余的量，大概农村有 1.6 亿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不是结构性剩余。城里大

概 1 千多万，一共 18702 万人的体制性剩余，剩余比例 24.2%。资本体制性剩余主要是国有企业，按照平均利润率计算闲置了 84 万亿，大概总的资产是 244 万亿，全社会总资产水平是 487 万亿，所以过剩的这部分资本，相当于 17.34%；农村的地剩余了 8641 万亩，剩余了 50.86%；农村的其他建设用地剩余了 20%；工矿建设用地剩余了 19.37%；空置住宅中去掉自然空置的这部分扭曲性空置住宅，大概 70 亿平米，占到总住宅的 18.90%。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把这些剩余的东西盘活。我们算了一下损失，2020 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 6.3 万亿元、4.92 万亿元和 5.34 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 6266 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 17.19 万亿元，为当年 GDP 的 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 15 年将会形成平均 1% 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要素短缺，因此调水改土极端重要。长江的水量是黄河

的 20 倍，黑龙江的水量是黄河的 8 倍左右，黄河虽然很长，枯水年间水量 400 亿立方米，丰水年间 600 亿立方米，所以长江这边不缺水，黄河这边极度缺水。降水量也是，长江以南降水多，黄河以北江水很少，常年干旱地区也很多。所以我们想，未来 15 年国土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中国 14 亿人土地面积开发率是 71%，美国 3 亿人的开发率是 86%，相差了 15 个百分点。日本这种多山国家和中国台湾多山地区，土地开发率也比我们高。中国耕地 / 国土比率只有 15.97%，美国 17.92%，印度 51.45%，欧洲 28.87%，日本 32.81%，韩国 18.36%，巴基斯坦 25.8%。中国农业人均耕地只有 9.2 亩，日本是 35 亩，韩国是 21 亩，欧洲是 600 亩，美国是 1070 亩。另外，按照城市建设每平方公里 1.2 万人的相对宜居标准，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75% 时，存在 0.7 亿亩的建设用地缺口，交通水利工矿用地缺口在 0.7 亿亩左右；耕地缺口在 5 亿亩左右。

我们全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8041 亿立方米；按人口平均每人占有年径流量 2670 立方米，相

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1/4；按耕地平均每亩占有年径流量 1800 立方米，约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2/3。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耕地只占全国部耕地的 36%，而水资源量占到全国的 80%；黄、淮、海三大流域，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 8%，而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 40%，南北水土资源相差十分悬殊。从土地资源来看，东南和南部山区较多，耕地相对短缺，水资源虽然充足但无法扩容可利用土地，而西北和北部由于气候干旱而导致的土地无法利用情况较多，通过水资源的调配可以实现土地改造和有效利用。无论是调水总量还是人均调水量，我国均为世界调水弱国。从总量上看，我国实际调水量可能不足 350 亿立方米 / 年，而加拿大、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为 1410 亿立方米 / 年、1386 亿立方米 / 年和 1260 亿立方米 / 年。从人均调水量来看，美国为 94 亿立方米 / 年、印度为 103 亿立方米 / 年，而中国仅有 29 亿立方米 / 年。

我国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和总量的不平衡，到 2025 年，谷物粮食缺口在 2500 万吨左右，大豆等油料粮食缺口在 10500 万吨，共计 13000 万吨。

2019 年粮食产量 66000 万吨，进口占粮食总需要量的 16.5%。按此数据宽松计算，耕地缺口在 5 亿亩左右。如果我国能够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 1000-1500 亿立方米，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补齐耕地供给缺口。再通过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促进规模化生产，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调水改土可增加 5000 万亩园地和 1.5 亿亩建设用地，从而化解农业内部种植经济与种植粮食结构调整的用地矛盾，扩大和丰富非粮食农产品供给。在农村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用于创业就业，满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加大城镇建设用地的供应量，缓解因建设用地紧张所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如地价房价暴涨、高房价过快挤压制造业以及国民经济房地产化等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每年北部西部 GDP 下降，东南地区 GDP 上升。今年财经记者采访我南北差距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很大，不只人均 GDP 在下降，GDP 总量也在下降，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是缺水。我去调研过的有些地区想上一些项

目，因为水不够，最后 600 多个项目都得剔除，南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人类发展都是在靠海 200 公里附近，和大江、大河、大湖周边，没有水的地方，经济就不发达。中国有能力干这个事，也有土地，南边有水，东北也有水，不干这个事干什么？现在有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讲，沙漠不能动，沙漠是地球的肺，干旱土地不能动，不要拿水去灌。我们测算这可以带来 0.5% 的经济增长，现在增长 0.2%、0.3% 都是很宝贵的。我国经济要到 2035 年翻一番，只能一点一点去找。要从新古典两要素增长模型改为三要素的模型，然后把土地投入，这是一个科学的办法。中央最近说土地要改革，土地要市场化，而且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把土地提到首位，我觉得这就是重视起来了。但是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过去几乎不认为土地和经济增长有关，我觉得是中国的一大悲哀。

我们刚才讲了生产角度，现在从需求角度出发，因为增长要均衡，创造了 150 万亿的增长能力，出口需求和国内消费需求只有 120 万，那么 30 万亿的生产能力就实现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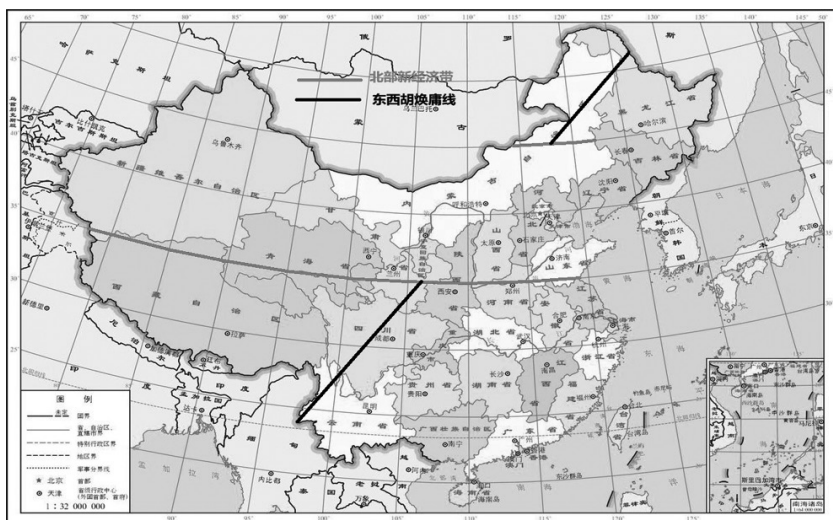


图 9 北部新经济带与东西胡焕庸线

年份	生育率 (个)	人口增长 (%)	滞后年份	减少劳 力(万人)	迭代收缩 消费(亿 元)	居民消费 总支出 (亿元)	消费产能 过剩(亿 元)	迭代收缩 占消费产 能过剩 (%)	GDP (亿元)	迭代收 缩占 GDP比 例 (%)
1992	1.88	10.69	2012	-345	-766	170380			538580.00	-0.14
1993	1.76	9.56	2013	-224	-1301	183805	35492	3.67	592963.20	-0.22
1994	1.76	8.76	2014	-371	-2254	198344	37841	5.96	643563.10	-0.35
1995	1.77	7.87	2015	-487	-3612	215980	40957	8.82	688858.20	-0.52
1996	1.68	7.76	2016	-349	-4676	236596	45261	10.33	746395.10	-0.63
1997	1.63	6.8	2017	-548	-6473	254690	44210	14.64	832035.90	-0.78
1998	1.55	6.25	2018	-470	-8152	277025	56055	14.54	919281.10	-0.89
1999	1.48	5.16	2019	-369	-9589	301837	58420	16.41	990865.00	-0.97
2000	1.22	3.86	2020	-820	-12744	297277	65762	19.38	1015986.00	-1.25

图 10：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消费需求迭代性收缩

需求也有体制方面的扭曲问题，计划生育造成的需求收缩已经无法挽回。我们来看一下计划生育造成的迭代收缩消费，2020 年已经占到当时总消费的 19.38%，第二列是前 20 年的生育率，第三列是

人口增长，第五列是后 20 年减少劳动力，第六列是迭代收缩消费，虽然迭代是一个慢性的，每年累积的量不大，但是无可挽回，并且累积起来也挺大。这是经济学上一个新的名词，就是迭代性的收缩。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一个迭代性的社会和经济收缩的社会趋势。因为四个人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这么 8、4、2、1 的这样迭代，整个社会和整个消费都是这么迭代收缩的，这在 20 年内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明年忽然有个办法，让大家都生孩子，可能还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办法，它一直迭代，情况就不太乐观。

另外就是房地产的挤出。2020 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 84142 亿元，即使 50% 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 42071 亿元，使农民失去 33657 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 36458 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我们大概的房价和收入比是 9.3，按照家庭以及联合国人均手持的不要超过 6，那么 3.3 这个部分转移了城市居民的 36458 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我国 2020 年的工业产能过剩 13.15 万亿，

假设一半是消费品，就是 6.58 万亿，也就是说，要是把土地收入的 50% 留给农民，房价收入比如果是 6，不存在消费品过剩的问题。高房价和土地财政收入，最后导致收缩。最后这列，挤出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率是红的，开始的量小，但是到去年，收缩了 24.37%，生产怎么能不过剩？高房价把消费挤出了，土地收入把农民的财产收入拿走了。内需怎么扩大？很难。而且我们发现，2020 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量分别是农村居民的 11.6 倍和 19.2 倍。

	土地出让金-亿元	被转移农民收入-亿元 扣除税收0.4	农村居民收入-亿元	农村居民应有收入-亿元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额-亿元	城镇居民收入-亿元	被转移市民收入-亿元	市民收入消费率	村民收入消费率	挤出市民消费支出	挤出农民消费支出	挤出居民总消费支出	全国居民总消费支出	挤出消费占消费支出比率
1998	508.06	304.84	17977.68	18282.52					73.54		224.18			
1999	514.28	308.57	18130.4	18438.97					71.36		220.19			
2000	595.74	357.44	18447	18804.44	3935.44	12.24	2006.30	79.38	73.18	1592.60	261.58	1854.18	36443.6	5.99
2001	1296.62	777.97	19150.81	19928.78	4862.75	11.55	2336.65	76.86	72.33	1795.95	562.71	2358.66	39369.1	5.99
2002	2414.76	1448.86	19787.15	21236.01	6032.34	10.12	2455.85	73.74	72.52	1810.95	1050.71	2861.66	44627.24	6.41
2003	5421.31	3252.79	20672.92	23925.71	7955.66	9.59	2978.19	71.86	72.23	2140.13	2349.49	4489.61	49034.16	9.16
2004	6411.34	3846.80	22915.9	26762.70	10375.71	10.18	4260.36	70.91	72.18	3021.02	2776.62	5797.64	55527.59	10.44
2005	5884.32	3530.59	25121.33	28651.92	17576.13	10.26	7297.69	70.16	75.82	5120.06	2676.89	7796.96	63695.18	12.24
2006	8076.22	4845.73	27296	32141.73	20825.96	9.7	7943.92	74.85	75.82	5946.03	3674.03	9620.06	84337.04	11.41
2007	12216.51	7329.91	30936.32	38266.23	29889.12	9.67	11343.65	73.49	74.51	8336.45	5461.51	13797.96	100048.10	13.79
2008	10259.65	6155.79	35192.46	41348.25	25068.18	8.29	6924.74	72.31	73.23	5007.28	4507.89	9515.17	115630.70	8.23
2009	17178.98	10307.39	37467.8	47775.19	44356.17	9.35	15891.96	72.57	73.47	11532.79	7572.84	19105.63	126964.30	15.05
2010	27463.67	16478.20	42093.27	58571.47	52721.24	8.88	17098.78	71.73	69.87	12264.96	11513.32	23778.28	146414.00	16.24
2011	33171.30	19902.78	48546.05	68448.83	58588.86	8.23	15875.23	70.76	70.61	11233.31	14053.35	25286.67	157930.30	16.01
2012	28519.38	17111.63	53876.84	70987.47	64455.79	7.97	15931.98	69.11	70.43	11010.59	12051.72	23062.31	130319.90	13.54
2013	41248.97	24749.38	59372.22	84121.60	81428.28	8.74	25527.86	69.85	79.37	17831.21	19643.58	37474.79	183805.20	20.39
2014	42964.05	25562.79	64891.25	90454.04	76292.41	8.13	19988.05	69.23	79.92	13837.73	20429.78	34267.51	198344.40	17.28
2015	32545.80	19527.48	68927.2	88454.68	72280.84	8.21	23494.60	68.58	80.75	16112.60	15768.44	31881.04	215980.30	14.76
2016	37457.26	22474.36	72908.32	95382.68	117627.05	8.47	34302.10	66.65	81.94	23548.39	18415.49	41963.88	236995.50	17.74
2017	52060.64	31236.38	77450.26	108686.64	133701.31	8.27	36699.15	67.16	81.56	24647.15	25476.39	50123.54	254690.50	19.68
2018	65095.20	39057.12	82441.34	121498.46	149972.74	8.61	45462.12	66.53	82.94	30245.95	32393.98	62639.92	277024.80	22.61
2019	72517.50	43510.50	88375.04	131885.54	159725.12	8.67	49188.70	66.25	83.19	32587.52	36196.38	68783.90	301836.80	22.61
2020	84142	50485.20	92402.9	142888.10	154566.96	9.04	51978.27	61.61	80.05	32023.81	40413.40	72437.21	297277.20	24.37

图 11：土地财政—高房价—挤出居民消费

当然出口也是一个需求，我们也计算了出口占 GDP 比例下降带来的过剩压力，去年好一些，去年

因为亚洲口罩，国外不生产，我们很多东西都消掉了。到 2019 年，一直是收缩的。

时间	出口总额	GDP	出口占 GDP	减少比率 %	出口收缩	工业比率	工业增加值	过剩压力 %
2010	107022.84	412119.30	25.97			46.50	191635.47	
2011	123240.56	487940.20	25.26	-0.71	-3472.13	46.50	226892.19	-1.53
2012	129359.25	538580.00	24.02	-1.24	-6671.56	45.40	244515.32	-2.73
2013	137131.43	592963.20	23.13	-0.89	-5289.89	44.20	262089.73	-2.02
2014	143883.75	643563.10	22.36	-0.77	-4949.65	43.10	277375.70	-1.78
2015	141166.83	688858.20	20.49	-1.86	-12843.71	40.80	281054.15	-4.57
2016	138419.29	746395.10	18.55	-1.95	-14538.50	39.60	295572.46	-4.92
2017	153309.43	832035.90	18.43	-0.12	-991.98	39.90	331982.32	-0.30
2018	164127.81	919281.10	17.85	-0.57	-5257.26	39.70	364954.60	-1.44
2019	155500.00	990865.00	15.69	-2.16	-21408.35	39.00	386437.35	-5.54

图 12：出口下行对需求的收缩（单位：亿元）

我们实验室通过对大量的数据模拟，最后发现国民经济“香港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造成了扭曲。如果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追高速增长的能力。我们给出的改革方案关键，是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让农民以地为本创业。把土地指标都拿走，农民没有事干，弄个猪圈给拆了，农民的宅子不让交

易，没有财产性收益，这恐怕都不行。未来十五年看，第一产业很难富起来，关键是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性收入。如果放开，那么政府即使收 30% 的税，农民也有 4.5 万亿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放开，以地为本，像当年的乡镇企业，当然要把村村冒烟、到处流污水的问题管好，其他的放开。那么，即使其他建设用地的 20% 从事第二产业，即使有 5% 的土地收益，每年也有 5 万亿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农民就会多 6 万亿消费，不用说 6 万亿，4 万亿也挺好的。

另外，要有竞争性和多样性的住宅供给，主要是让人口流动，城里的人可以到农村买房子，农村的人拿着卖宅基地的钱可以到城市买房，双向置换。通过合作建房，私人建房，把土地房屋的价格水平稳住，或者降下来。房价收入比逐渐下降，这样才能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挤压的 3 万到 4 万亿的消费能力。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出口指望不上，人口也指望不上了，现在只有这个改革才能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在供给上做文章，这不行，即使有 1 千万亿的生产能力，没有需求，

不可能实现改善。

最后一个问题，金融安全。现在各国经济都在向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近期美国 1.9 万亿量化宽松政策又发布了，去年主要经济体国家债务增加了一个很大的数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交易，如果 GDP 流量增长比较低的话，扩张的债务实际是不动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房屋资产是信用和币值必然的保证机制。我们现在全国非金融债务占 GDP 比率从 1995 年的 101.7% 上升到了去年的 272%，债务存量质量比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比较大，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比较大。我们房地产这部分债务比较脆弱，国有企业债务比较呆滞。我们的货币供应量 M2 占 GDP 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99% 上升到了去年的 217%，水平已经高于很多主要经济体了。美国即使放出 1.9 万亿的刺激货币，它的货币 M2 占 GDP 的比例不高，估计目前可能在 90% 左右。未来 15 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中国债务和货币占 GDP 比例毫无疑问会继续攀升。现在只有土地和房屋可以抵押，人怎么抵

押？比如把周天勇抵押，贷款 100 万，哪个银行都不要。货币怎么抵押？存款抵押用于贷款，也不合理，直接使用存款就可以了。债券怎么抵押？用债券去抵押，再贷一点款，银行也不同意。除了资产债务证券化，其他的都不太可行，但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太高了，美国两房债就是这么垮台的。最后就是土地和房屋，土地和房屋是债务和货币的基础，但是不允许交易，不允许资产化，货币能稳定吗？中国现在只有 350 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再就是一些写字楼等，而且很多已经抵押过了，比如按揭住宅。农村有 500 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还有 300 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国有企业土地是不允许交易的。现在政策上可以交易，但是规划与用途管制等等导致交易困难。其他经济体高负债地刺激经济，我们也要刺激经济，基础是什么？怎么样能保证货币和债务不出问题？宏观经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1998 年以后我们把城镇住宅市场化了，很多货币就这么放出来的，只不过土地财政单一开发渠道将房价提高了。现在一刀切，城镇住宅也不允

许交易，货币很难不崩盘。我们实验室现在进行了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不放开城镇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因为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996 到 2020 年间，GDP、债务和 M2 供应年均增长 8.66%、14.8% 和 15.51%。如果未来 15 年 GDP 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 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 10% 和 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 6.8 万亿元、57.6 万亿元和 31.7 万亿元；到 2035 年时，债务余额与 GDP 的比例上升到 465%，M2 与 GDP 的比例将会上升到 327%。

我们模拟，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 800 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 500 万亿元左右和 150 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

145 万亿元的土地资产。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 6.7% 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 53.3 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 6.8 万亿元的新增 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实实在在地研究点问题，后来发现原来的增长模型不能用，最后找出这些比较可靠的成长潜力。历史上三次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是来自改革。所以我们有几个结论：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 0.41%、0.31% 和 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 1.11%。总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年均为 3.05% 或 3.6%。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 1% 左右。三是调水改土发展战略性举措，增加土地 1.5 亿亩建设用地、0.5 亿亩园地和 5 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0.5% 左右。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增

长潜能。

我们这个团队这几年就干了这么一个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乔依德：谢谢周教授给我们作了演讲。他的中心思想最后也总结了，就是说，我们要达到 2035 长期规划，必须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他的首要思想。至于怎么改革，他也提出了一些想法供大家参考和讨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有人写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过去 30 年都非常稳健，其中经历了三个改革周期，而改革的红利都不小，下一轮改革的红利是否足够大，可以打破历史规则，让两条曲线分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未来 15 年的外部需求潜力。我也补充一下，因为你刚才讲了改革，其实加入 WTO 还不完全是改革，这个也是开放，开放对于 2035 规划会起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周天勇：确实中国很巧，每一次改革的时候都

有一拨人口增长，第一次改革是 80 年到 87 年发动的，有一拨人扩散性的增长，第二拨是九几年，就是一拨人口上行的增长，第三次改革开放，WTO，也是最后一拨人口往上增长。所以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实际是重叠的，或者是加持的。我们那时候恰好遇到这个时间，三次都是，可能是老天照顾我们。但是有一个问题，80 年代到 90 年代那一段，90 年代中期，居民的收入和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 GDP 大量是劳动创造的。假设大部分 GDP 是资产创造的，大量的是基础设施工程，那么就与劳动力收入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要与改革和增长结合起来，只有提高人的参与、人的收入，抵消或者扛住人口叠加性收缩。我们也提出，未来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现在看来低的这一块是农民收入，比如财产性收入，必须得退还给他们。你把所有的土地指标都拿走了，现在又有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回到农村去了，一大堆窝在那里，你又不让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这就极大地抑制了增长，毛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要抑制资本性收入、金融

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我觉得非常关键。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土地规划好、整治好，你把土地弄得那么死，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不能结合，怎么就业啊？现在猪也不让养了，鸡也不让养了，弄个小厂子就给拆了，这个做法恐怕不行。产业怎么去引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不能把土地全拿走。

我们的居民收入大概占 GDP 的 43%，消费才 29%，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扭转局面。因为需求限制，所有产能过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开放，我们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其实我们最后一拨增长，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因为它要跟国际规则接轨，改革了一系列的法律。中国的法律大概改革了 3000 条，地方改革了 19 万条，清理了 3 万条法律法规，这是相当大的改革力度。这一次改革正好碰上第三拨人口起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里就业，这一拨进来的是欧洲和美国，特别是一些 500 强企业，进来以后又拉动国民经济 10 多年的高速增长。

我们这个团队也测算了加入 RCEP，发达国家

在贸易中获得的成长潜能不是太大，只有中国、韩国这样的国家加入的成长潜能很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群，我们都要加入。当然人家说，你加入群，你得按照我的规则。即使按照他的规则，以我们现在的生产水平，只要零关税，只要我们东西能出去，就可以。我们发现，加入 RCEP，所有国家都遵守这个规定，中国也遵守这个规定，就可以增加一个点。所以开放还能增加一个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在布局的时候，要布局进口与出口，你不能大量的全来吧，这样又会供给大于需求，找不到增长点。

乔依德：还有二个问题。经济学界有人说，调水不如调人，让人口自然流动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形成集聚效应更有效。请问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调水还有一个生态问题，能不能完全不破坏生态？

周天勇：我们为什么想起调水改土这个事呢？因为那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劳动加上资本，没有土地要素。我们说，为什么新古典增长模型把土地去掉了呢？最后去找呢，发现第

一个原因是 70 年代发达国家的土地开发已经很成熟，但增加的土地量不多。如果不多的话，投入量就是一个垂直的线，不是向右斜的曲线。第二个原因呢，发达国家的大量土地是用于农业，农业产出在 GDP 的比例越来越小，我们国家原来是 20% 多，现在第一产业只有 7%，可能最后就剩 2%-3% 了。所以，即使把土地变量弄进去，它的贡献率也很小。最后他们一想，干脆把它删掉算了。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土地要素是永久不磨损的，因此就不计算了。但是中国呢，土地闲置了 20%，你把 20% 的土地要素再投入，利用古典模型就解释不了。

生态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考虑。第一，如果把发电修坝和调水结合起来，这个影响是很大；但如果坝小一点，或者只是把水引过来，这个又不一样。第二个，北方如果没有水，就没有生态，很多是干旱沙漠，干旱土地。我小的时候在潜山那个地方住，我在那里呆了九年，小学、初中都在山里，光秃秃的都是草，秋天就黄了，冬天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我们那个县大概在 70 年代的时候把水引过来，引过来以后种的树都活了，山上有灌木、

草，都绿了。当然，它是双刃剑，你把水污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水的地方有生态，没有水的地方没有生态。如果水少，净化自然的能力也差，特别是西北。西北有大量的干旱土地，我到过罗布泊农场，那块本来是沙漠，后来引了昆仑山雪水，就改造了农场，有大片的灌木，大片的树，还有耕地。所以我认为，还是得调水，当然调水的成本是问题。我认为前期的南水北调，第一，机制不行，国有去干，没有监督，成本太高了。第二，现在的调水可能要更多的管道。我那天参加一个会，他们用竹子弄，又生态，强度又高，又不腐烂。我那天参加了一个会，就是调水改土的时候确实要注意环境，比如会不会弄在地震带上，比如引渡桥太高危险性很大等等，我觉得这些要注意。另外，你把上面的水都调光了也不行。还有我们境外出去的水也特别多。这几年的南水北调，我觉得河北、北京的地下漏斗慢慢就起来了，实际上改善了生态，改善了北京的环境。我到官厅水库那个地方去，原来是没有水的，小得不像样，现在水库满了。北京这几年，我觉得气候好多了。我认为还是要把中国

建设成调水强国，而且调水和改土要结合起来，调水和保持生态环境要结合起来。

调人呢，现在是这样的，英国的格拉斯哥最鼎盛的时期有 130 万人，98 年我去的时候，只剩下 60 万人，他们都跑哪里去了？跑南边去了，跑英格兰、威尔逊那里去了。英国是人口自由流动的，也不管制，我带着孩子到那里租个房子，孩子教育也没有问题。中国户籍下的人口流动，只是年轻人全跑了。北方这么大一个地方，经济衰落，人口越来越少，消费越来越少，产业萎缩，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些地方要上经济，上人口，它的水不够。我现在想，我们现在土地红线不能动，土地这一块计划经济实行得这么严，理由就是没有土地。那么我现在给你弄出来 7 亿亩地，你还弄计划经济吗？计划经济本身造成了土地大量的闲置，干脆把你的借口灭了，干脆给你供应够，再加上改革，把它盘活，土地就够了。我们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

乔依德：谢谢周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很精彩的演讲。周教授强调为了胜利达到 2035 的目标，要进行改革，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改革怎

么进行下去，他提出了一些思想，供大家参考。由于疫情，我们这次只能在线上，希望疫情早一点结束，我们不但在线上能开会，在线下也能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周教授给我们的演讲，再见。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应对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2021 年 4 月 8 日

胡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顾问）：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应对”，是一个务虚会。我们本来想再观察一段时间，乔老师说拜登坐镇白宫已经两个多月了，有必要进行一下梳理。我们听了之后，也觉得确实有必要进行梳理，看看拜登对华政策到底具体是怎样的。

从拜登当选的两个多月的情况来看，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有一些失望。在他没入驻白宫以前，我们以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比特朗普政府要好一些，但是现在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最近两个多月以来，从拜登政府一些重要的部门负责人讲话来看，其对华政策不太理想。比如，国务卿

布林肯提出的对华政策是合作、竞争加对抗。贸易代表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加税政策也没改变，还要进行重议、审议。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听证会上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他可以当选中央情报局局长，会马上结束中央情报局对反恐的关注，全力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对华政策上。国防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认为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在我国南海加大了军事布局的力量，特别是最近两天，美国侦察机都到了我们家门口来侦察。

这些情况怎么来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是否为了照顾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讲给美国国内的政客们听，还是会在拜登任期内一直贯彻下去？这些我们正在关注中。相信各位专家和学者也在关注美国涉华政策的变化。乔老师提出来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需要梳理，我们也觉得拜登当选已经七十多天了，也有必要梳理一下，为拜登入主白宫一百天和半年的阶段性评估做一些前期的准备。今天，请大家来，我们做一个座谈会，围绕这些问题，大家畅所欲言。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刚才胡所长也讲了，我稍微补充几句。今天这个题目等于是三部分，拜登对华政策的梳理、评估和对策。梳理，我想并不是作为最主要的部分，只是一个基础。我想主要是后面两点，其实，拜登当选也不是两个多月，已经接近三个月了，从1月9日，现在已经4月8日。

任晓（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拜登就职是1月20日，这要看怎么算了。

乔依德：那么从拜登就职开始计算是两个多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梳理部分，刚才胡所长讲了，我也不重复了。

评估方面，首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国内写文章有两种观点，一个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在形成中，比如我看吴心伯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博弈，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形成中。有的认为基本上形成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梳理来分析。关于评估，有几种说法，一个认为现在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一个想法，现在是 Engagement 2.0，这是不

是太乐观了？或者就是拜登 1.0，他自己的想法，结合一些奥巴马的想法，结合一些新的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个评估，梳理事实不要最主要的，评估分析是最主要的。

第三部分就是对策。我们国家在应对拜登的对华政策中，我认为包括两部分，一是前两个多月我们的应对，哪些方面做得可以的，哪些方面还可以改进的。二是对我们今后的政策有哪些建议。中美关系不单单是中国和美国，还涉及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欧洲、日本的关系，包括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是内部发言，下面可以不可以这样：第一轮发言，每个人讲不要超过五六分钟，以后大家可以再补充，再讨论。下面就请大家发言。

任晓：我先直接来试图回答乔老师的问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有没有形成？我认为没有形成。应该说是在形成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的总统上任，一般情况下，前半年是一个政策评估的阶段，也就是 **Policy Review**，各相关部门对于各自负责的领域在做评估。比如说，国防部的中国战略工

作组，在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的领导下正在展开评估，为期四个月，也就是六月份完成。其他部门的评估完成时间也差不多。贸易代表通过听证的时间不久，也要进行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关的贸易问题等等，现在都没动。阿拉斯加谈判以后，国安会也要进行评估，暂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说法。

在这个过程中，出来了一个“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有的中文翻译成“临时的”，有的翻译成“中期的”，我认为都不够准确，准确地说法是“过渡期”，整体翻译为“过渡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就是从拜登上台到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这段时间的国家战略指南，以总统的名义公布的在这个过渡期内指导各个部门的指南。

对“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怎么理解？我也不完全赞成。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有可取之处，即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中形成了某些东西，或造成的一些既成事实还在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可以讲“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

义”，但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比如说，特朗普在任的四年中，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修复不易。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看成是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极尽打压、断流、脱钩，导致两国高层领导人员、基本人员往来遭遇重重障碍，还打着所谓“全政府、全社会”这样的旗号。这些成为特朗普四年留下来的有毒资产，还在延续，没有明显变化。

Engagement 2.0，我认为完全不对。因为特朗普政府班子，有一点是很清楚的，Engagement 这个框架不能用了。在这几年里，美国的政策研究界相当普遍的看法是，Engagement 已经失败了。这一点也在延续当中。那么取代 Engagement 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从这段时间来看，看来是 Competition。特朗普政府也讲 Competition，区别在哪里？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Kurt M. Campbell 和 Jake Sullivan 的文章“不带来灾难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就是说竞争要避免灾难。在阿拉斯加之后，Kurt M. Campbell 有一个说法要“avoid unnecessary provocation”，即“避免不必要的各种

挑事”。

我总体上做一个评估的话，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性在下降，我相信这是未来四年和过去四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但是竞争这一面还是会相当突出的。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就接着任晓的发言谈点看法。我觉得认为对美国对华政策还在形成过程当中，这恐怕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基本成形，目标也基本定下了，毫无疑问，就是动用它一切可能利用的有利的手段，或者说相应的优势，形成一个广泛的西方国家的联盟，来对中国形成包围也好，压制也好，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这是它的基本原则。

我也同意刚刚任晓讲的“竞争”，拜登的多次讲话，布林肯和坎贝尔等主要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推手也讲了类似的话。他们的底线就是不会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点目前是要避免的，但这不等于

不利用军事手段构成对中国的压力。

现在很清楚，在美国推动下，“北约 2030 计划”正在制定，就是把北约和亚太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提上议事日程，来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这个已经确定了，欧洲国家必须要被它拉着参与到亚太的竞争当中去。北约本来的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现在加了一个目标就是中国。而且北约秘书长在与布林肯会面以后，对媒体的讲话也非常清晰，北约接下来就是要加强和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合作，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是北约之前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的。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地认识。

当然，美国如何具体地使用相关的政治手段和中国打交道，这会根据国际事务间的变化、中美两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体的问题会有具体的手段来展开。比如说贸易，它先不谈。尽管戴奇强调高关税对美国经济、美国企业构成影响，但美国现在还没有考虑取消。因为它是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但这个“讨价还价”是放在和中国竞争的大背景下。虽然美国自己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但要重

新评估这个高关税对中国是否也构成冲击和不利的影​​响。如果有，毫无疑问，美国要评估一下这个不利的影​​响，对自己大还是对中国大。如果对中国大，美国未必会马上取消，这点很清楚。

但有一点，美国不会明确地用以前曾经用过的“冷战”词语来进一步激怒中国，避免构成中美之间热冲突。但美国会在很多认为不会构成军事冲突的基础上，全面用“竞争”这个词，来实现对中国的压力，或者是说遏制。这点我觉得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它的抓手也很明确。抓手是什么？就是人权意识形态，人权意识形态对欧盟还有其他盟国是具有凝聚力的，如果讲到经济、贸易、应对气候，它们之间的凝聚力很差。

另外一个就是地缘政治上的安全问题。美国现在一再强调，中国的崛起是挑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的崛起，对欧洲也好、对美国的亚太盟友也好，构成了安全的威胁。不光是军事的，也是广义的。比如，我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高关税。再比如，现在日本也很担心，中国强了以后，会不会动不动就利用大市场来制约它？就是用这个来做文

章。所以美国号召盟友要团结起来。这些都是有号召力的，地缘政治、人权意识形态是两个主要的抓手。

如果这个抓手一直往前推，成为整个媒体主要讨论的议题的话，中国会处在越来越不利的环境中。对这两个，我们现在无法做出任何让步，经济、全球治理、环境等我们可以做出让步，做出承诺，来推动缓和双方或多方关系。但是现在美国所讲出的这两个，是打我们的软肋，是没法让步的，必然会跳起来，然后以更加强烈的态度来回应。这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态势。

目的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你的竞争优势，赢得空间、赢得时间，来让美国调整国内的矛盾，使美国经济渡过这次危机，重新复兴。最近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很好，拜登又提出2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把美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带动起来，下一步对中国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

乔依德：非常感谢，我们讨论不是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把

问题这样讲了以后，更加立体，对大家更有意义。

韦宗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院长）：我同意前面老师的观点，我觉得拜登政府现在总体对华的战略定位应该是清晰的。从拜登本人，过渡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布林肯第一次发表的对外政策的演说中，都能看出，认为中国是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安全、意识形态全面的挑战。唯一具有全方位的实力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的就是 **peer competitor**，即“同辈的竞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基本点就是防止对美国出现所谓“同辈的竞争者”，指的是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军方及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美国所谓的“同辈竞争者”，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当时他们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中国已经接近要成为美国的同辈竞争者。他们觉得要从科技、军事、经济这几个立场和角度出发，严防中国在科技、经济、包括安全方面赶超美国。从这个定位，我觉得拜登政府其实基本上达成了共

识，认为中国差不多已经成为对美国霸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同辈竞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不仅具有挑战美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更加具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一个是 Power，一个是 Will，不仅有实力，而且有意愿。

所以说美国要对中国采取应对措施。前几天，赵明昊在我们研究院做了报告，提出了“四全”，我非常认可。美国采取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全世界的措施，全世界就是联合盟友和安全伙伴共同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战略定位应该是清晰的。唯一不清晰的就是在这个战略定位下，到底对中国要从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节奏怎么把握？这是在评估和制定过程中的。

国务卿布林肯，特别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和以前负责制定亚太政策的坎贝尔，现在也在制定亚太或印太的政策。国防部哈格尔领衔制定了国防部的对华政策。那些曾经在奥巴马的团队任职过、相对于布林肯温和的人基本上出局了。哈格尔、坎贝尔联手写过文章，认为对华政策失败了，不能继续这样的政策，要改弦易辙，采用强硬的手

段，用他们所谓的“实力地位”，联合盟友和中国打交道。

从国会的角度来看，我数了一下，第 117 届国会以来已经提出的涉及中国的法案和决议案大概已经有 60 个，这几天应该还会继续，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特别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召集制定的“中国法案”。实际上去年九月份，舒默等一些人提出跟中国有关的法案，叫“美国领导法案（America LEADS Act）”，600 多页，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包括：第一，重振美国的科技、经济、安全；第二，应对中国各方面的挑战，包括科技、经济、安全等，包括联合盟友，强调民主人权等。现在舒默还在准备“中国法案”，但可能阻力也比较大。总体来说，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对华问题上不想输给共和党。拜登包括他的团队也认为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新冷战”，要从实力地位制定对华政策，但肯定是竞争大于合作。布林肯也提到了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显然是比奥巴马时期强硬得多，不是为接触而接触，主要是竞争为主，加以必要的对立和对抗。整体对

华政策取向是强硬的。

我今年年初也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拜登执政之后，中美关系的第一场硬仗可能不是经贸和台海，而是人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对于拜登来说也没有退路。所以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根本原因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制裁我们。现在我们发现，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不能退让。比如台湾问题涉及到主权问题，人权问题实际上跟香港、新疆相关，也涉及到我们的主权问题。后面要提的意识形态，涉及到我们执政的政治制度问题，就会发现中美关系很多问题上，都没办法退让。在经济问题上，美国要求我们改，涉及到我们的经济体制，没办法改。我觉得阿拉斯加的会谈可能是中美之间进入新冷战第一场正面的对抗，我先就说这么多。后面再说未来的趋势。

胡华：到底怎么来看阿拉斯加会谈？是谈崩了，还是怎么样？

韦宗友：闭门会双方还有一些合作的成果。

胡华：现在美国在大方向上是这个。具体的，

反过来我们对美呢？包括这次会议，到底谈得怎么样？现在都没数。现在据我们了解，人家说谈得满好的，第一场是不欢而散，第二次会谈是谈得非常好。

乔依德：非常好也没用。

徐明棋：双方都觉得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任晓：美方用了三个词讲这次的阿拉斯加会谈。第一个是 *substantive*, 实质性的。后面两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是 *comprehensive*。

任晓：我好像和你看到的不一样，我想起来再补充。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博士）：布林肯和沙利文在会谈之后，那个吹风里讲得还可以得。

邵育群：他们之后给盟友以及中国也在吹风，里面有这三个词。

韦宗友：这是他们俩更大的外交活动，他们要

是说自己谈崩了，就说明他们失败了，不称职。所以就是谈崩了，也会说没谈崩。

任晓：应该说可以，比预想的要好一点。

徐明棋：我觉得无所谓谈崩，双方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觉得在自己人面前、在国内都有交代。我们这里认为不是失败。美国接下来还会谈的，只要谈就是了，就这样。有什么共识吗？没有。

乔依德：我觉得刚刚韦宗友教授在你们俩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分了具体哪些地方是清晰的，有一些地方还不够清晰。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当然大家还可以再谈。一个是怎么看阿拉斯加会议。第二个是意识形态抓手等。除了这个以外，欧洲是不是已经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了？默克尔的讲话意味着什么？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动向，大家也可以分析。我们这边的一些动向，比如说俄罗斯外长来华访问，我们跟伊朗签了大单，这个去年就说了，那为什么现在签？还有访问中东，还有四方高层论坛，日本的态度又有变化，大家可以继续谈。你们几位对我们的对策好像都没有评论。对于我们自己

有哪些建议？或者说哪里做得很好很对，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的？我想也可以讲一讲。

邵育群：前面三位老师讲的，我觉得都有道理。任老师讲的，我也挺同意。我听徐老师讲，我也挺同意。虽然你们俩的观点有点不一样。

我自己总体的看法是，美国总体的对华战略应该定下来了，认为我们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就像韦宗友讲的，具体的节奏怎么把握，政策怎么出，还没想好，或者说是正在做评估。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现在不跟中国谈大的框架，反复强调安克雷奇不是战略对话，暂时不愿意同我们进行战略对话。他们想的就像哈格尔讲的，不能冲突起来，所以美国现在不停地跟中国谈危机管控和危机防范。去年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下半年与我们谈过一次。现在美方大的地方不跟我们谈，为什么？第一，之前谈得很烦。国内的情绪在那里，所以不愿意谈这些大的东西。第二，美国国内的形势还没完全重建起来，这个时候谈这些会吃亏。还有很危险的一点是，现在的框架还不稳。布林肯说，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要竞争的时

候就竞争。哪有这么简单？

乔依德：合作可能是明确的。但哪些是对抗？没有明确提及。

邵育群：比如说台海问题是很危险的。最近的态势很不好。如果说我们跟着美国讲所谓危机管控和危机防范，这是要出问题的。美国现在这个决策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与它讲清楚，并不是在工作层面上进行危机管控和危机防范，中美两国就不会发生冲突。现在双方要发生冲突的点是很多的，但是美国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点要警告美国人的。

第二，我们特别要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的周期，如果从林肯开始，林肯到胡佛，后面是罗斯福到卡特，再后面是里根开始，现在里根那套东西被美国国内否定掉了，但是拜登能不能开启一个新时代？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如果这个新时代被他开启，后面就是几十年新方向的发展，这对中美关系以及跟中国竞争等等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好好地研究这套东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机会增长、绿色经济发展，

以及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这些东西都是一盘棋，我们要放在一起研究。但这样还不够，不能简单地看待其对华战略、全球战略，从中东挪到亚太，不是这样。国内国际是连起来的，气候政策、安全政策、贸易政策都是连在一起的。

第三，美国现在同盟体系的演变非常值得关注。这方面我自己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我觉得有几点需要讲一下，美国现在的同盟体系正在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是议题的联盟，第二个是功能性的联盟，第三个是所谓区域性的联盟。比如说，围绕半导体搞一个东西出来。它的同盟体系在原来的亚太同盟和北约大框架下做了很多灵活的调整。这次峰会的意义，我觉得不在于安全或机制性合作，或者终于看到了领导人开会，重要的是必须要为这个地区提供实际的东西。之前美国人为什么很多时候在亚太不得人心？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实际的东西，美国拿不出。如果疫苗等它能够拿出来，就会得人心，这点它能不能做成我们要高度关注。我不觉得美国现在要做联盟就能做得成，美国自己心里很清楚，即便做成了也做不到预期的程度。最主要

的因素是，第一，国内牵制非常大，就是乔老师讲的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因为只要特朗普主义的思潮还在，它的盟国就很担心。第二，它的盟友的利益和它的利益不完全相同。它的盟友和中国的关系，有的远，有的很近。基于这点，美国想对它的同盟体系做调整，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力不从心。我们怎么去影响它的同盟体系？我觉得这是很长久的一个课题，现在下的功夫还不够。

第四，我们怎么在中美竞争加强的背景下，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让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我听到很多人讲，拜登只是和特朗普的调子不一样，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遏制中国发展。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去做的话，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做成的。政策信号是很模糊的，对于很多政策信号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比如说，布林肯现在不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是和特朗普有很大区别的地方。我们这边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他本质上就是

要推翻我们，那么我们后面就没办法做下去了。比如说现在美国在台海很多军事行动，想要干什么？美国是想要拒绝大陆去统一台湾。而我们这里很多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阻止你支持台独。一个关注在台独，一个关注在统一，双方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都是不停地做军事施压，不停地有各自国内政治的需求。这点就会比较危险。

第五，拜登政府现在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政府遗留的负资产有两面心态。一方面，他想利用这部分负资产。比如这两天在谈伊朗核问题的时候，要把特朗普政府给伊朗加上去的与核协议不相关的制裁梳理清楚，然后看要不要把这些制裁拿掉。现在对台湾的事情上，特朗普在任内最后几天出台放松美台官员交往层级的政策，是否要把这个政策去掉？拜登政府现在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这个坏事情不是我做的，但是又非常乐见美台关系在往上走。如果北京方面提这个事情，就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留下来的，与我拜登政府无关。一方面他要推翻特朗普做的那些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利用特朗普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来达到现在的目标。这一点我们要

分清楚，哪些东西是他想利用的，哪些东西是他确实不要的，然后我们再做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比较清楚。

另外，拜登政府现在想利用中国来推动美国国内的团结。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这其实不是那么好做的，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很多让拜登政府为难的事情。第一，如果把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如果往恶劣一点的方向上推，美国国内政治是要去处理的。第二，拜登这两天介绍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就是讲中国现在基础设施起来了，自己已经比中国落后很多，所以要赶快推进。拿中国说事在美国国内有负面意义，也有正面意义，我们怎么看这两层意义，再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对付他？这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最后，就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上，在气候这块推得非常快。克里是很有危机意识的，觉得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气候要赶快推。有一个说法是他最近要到中国来，有一个说法说他要来上海，他这两天在南亚，今天应该在孟加拉。后面来是有可能的。

邵育群：不管怎么说，气候这个议题推得非常猛。但是在跟我们竞争、跟我们对抗的那些议题上，却调整得很慢，所以现在是美方掌控节奏。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好我们的节奏是什么？如果气候上我们跟得很紧，因为我们确实找到一个点跟它合作，想缓冲双边关系。跟着它走，我们节奏会被它带过去。我不知道我们的节奏是什么。

王震：我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胡老师关于美国仇恨亚裔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多是在外交上和宣传上表个态，其次就是获得一些道义上的优势，仅此而已。战术层面没法操作。因为相当一部分亚裔，非常不喜欢跟我们发生联系。而且我们插手之后会更麻烦，在国际上更麻烦，在操作层面也很难做。

第二个问题，乔老师刚刚提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不是成形？我的观点跟刚刚几位接近。战略层面方向目标都明确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是延缓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和国际体系造成损害。这是毫无疑问。但具体的操作层面，利用哪些议题来做文章，他们还在试探、调整和摸索的阶

段，既包括对中国的试探，也包括对国内政府极右翼的试探。

讲两个小点，一个是对华政策定位，一个是拜登政府政策跟特朗普是否一样。

拜登对华政策定位目前还没有明晰的说法，但我觉得对华定位已经完成了。拜登已经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完全沿袭了特朗普的做法。中期的战略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中美关系的主调，变成了竞争性合作，竞争和遏制优先于合作。九十年代，中美即有合作也有遏制。现在美国人明确讲竞争优先于合作。竞争如何实现？这是接下来比较难预测的。竞争需要规则，美国提出来基于规则的竞争，涉及到话语权的争夺，涉及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

拜登的政策和特朗普有哪些不一样？拜登也有向中国示好的一面。国内的媒体解读拜登政府时，出现了不少误导读者的报道，觉得拜登政府很强硬，因此忽视了拜登上台对华的有利的因素。拜登政府中有真正了解中国事务的官员和专家的组成的团队。特朗普任职后期，很多关键职位是空缺的，

拜登团队人才济济，而且与外界有很好的沟通，跟特朗普搞小圈子的行为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此外，拜登及其身后的民主党精英们看待中美合作的时候，比共和党稍微理性一些。共和党右翼有强烈的冷战思维，民主党主张的是与遏制竞争而不是冷战。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释放了很多善意，但我们这边报道的比较少。

讲几个细节。

拜登上台后一直回避谈论中美关系，其实是在有意拖延这个事情。特别是为了缓解因大选造成的政治混战和舆论压力。这其实对于我们有利的。拜登春节与习总书记通话，虽然没有具体的主题，但至少说明他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领导人。

2月16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州演讲时，用了文化规范的差异这个词来评论我国的涉疆政策，为此美国的右派对其进行了激烈攻击。拜登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逼得太紧。这虽然是个小的细节，但不应该被忽视掉。

上个月的在阿拉斯加进行的会谈，其解读也有点歪曲。我认为美国的强硬态度一开始有很强的做

秀动机，背后双方都表现得很不错，不过开始确实是有了一定的国内政治目的。

美国人为什么说阿拉斯加会谈不是战略性的会谈？拜登上台之后要重建西方同盟阵营的时候，不想营造出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战略性对话的形象，否则容易使其他盟友感觉被出卖。实际上美国能够坐下来谈，就是一种姿态，就是一种成功，我觉得这方面要解读得更多一点。

讲不利的因素。

一方面，美国虽然有合作的意愿，但拜登现在是戴着镣铐跳舞，很大程度上身不由己。他需要解开特朗普给他留下的包袱，他现在的行为更像是在为特朗普擦屁股。特朗普执政后期留下的问题非常尖锐，特别是美国对华政治生态的恶化。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驻华大使在美国国内承受巨大压力，中国有汉奸的说法，美国有美奸的说法。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在学界和政界都有体现。美国对华的舆论和社会生态在发生变化，很多调研数据可以支撑这一观点。拜登需要面对已生效的政策留下的负面后果，如高关税、台海争端。民主党上台也

很难回到过去，即便想回去，右翼也会极力反对，拜登也没必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做这个事。

还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是拜登自己的执政风格。拜登当总统前，已经在美国政界活跃了多年，圆滑、老练是他的特征，这说明他缺少像特朗普和尼克松那样大开大合的魄力，不可能做出非常出格的事情。

第二，拜登的民意基础。虽然拜登赢得了选举，但他的基础是弱的，他也很清楚这一点。特朗普的支持者的忠诚度远远高于拜登的支持者，这个情况很重要。外交不是拜登的优先事项，即使最后回到了外交问题上，也是因为外交是他的团队最擅长的事情。

第三，拜登的身体状况需要密切关注。是不是能够干完四年，这可能有变数。如果他干不完四年，哈里斯对外交、对中国一无所知，严重依赖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如果哈里斯连任，下一届美国政府的举措会有变化，这个事情值得关注。

最后，我们忽视了拜登政府面临的来自盟友的压力，这是我们完全忽视掉的地方。在涉疆政策

上，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在涉疆政策上，拜登政府的表态一直保守，只有布林肯对外宣称种族灭绝的言论。拜登政府没有在这个话上往下走，拜登也没有表态，拜登之前的表态带有给自己找托词的感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走得很靠前，特别是加拿大和英国。拜登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而他们1月12日便通过了法案，出台的目的就是企图将拜登新政府裹挟进涉疆问题中。盟友对美国施以压力，希望美国把同盟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

郭爱军：梳理、评估和对策，这个题目本身是难的。今天我觉得对策还无从谈起，因为前两项都比较难。

首先，我们评估什么？评估今天美国可能的投入度和未来可能达到的力度。我们过去判断未来中美将是高投入、高力度。高投入就是指双方都把与对方的关系视作与本国国运相关的最大变量因素，带动所有力量投入，这个投入可能已经超出了原先一对一的范畴，将来可能会形成一对几的新局势。投入度是多少？今天无法了解。其次是力度。双方

力度交替上升，力度会攀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为很难评估。评估很难，当下较为容易做的事是梳理。我个人认为，在数据方面，我们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量少，且质量偏低，所以我们进行梳理是比较难的。

第二点，胡所长和乔老师为什么放到今天谈拜登，非常有道理，我们可以分为两个百日。当选的前一百日新政，是每个当选总统必然有的。前面的百日新政一般来讲，对外交的关注度、优先度低于国内事务。而且他们一般会侧重于相对简单的承诺，以及推翻前人的政治遗产。这一般是当选前百日，新总统阵营会做的事情。

第三点，就是后面这一百天到现在。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的行为逐步过渡到相对复杂的程度。但就像刚刚王震老师所讲，我们看到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对中国的态度，和对美国人的承诺，相对来说是含糊的。也就意味着，还在形成当中，目前比较难做的是相应的判断。我认为今天我们还可以做另外的思考。

第四，拜登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补短板。因为

他在和特朗普的竞选当中，对两个议题做出了长期承诺，一个是抗击疫情，一个是种族问题。经济问题上明显是短板。在我看来，他现在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在补短板。疫后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这块是他的短板。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这部分内容将是他工作的重心。

第五，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外界对美国新政府的态度。例如看看欧盟是怎样理解拜登政府的施政举措的？最近欧盟商会公布一个报告，名字叫做“脱钩”，讲的是中美脱钩的风险，明确描述了四种脱钩。第一种是宏观脱钩，主要体现在政治和金融层面。第二种是贸易脱钩，主要是供应链和关键要素投入。第三种是创新脱钩，主要是研发和各类的指标体系或者国际标准。第四种是数字脱钩，主要是数字治理、电信服务以及相应的一些内容。

第六，我觉得可以评估一下欧盟所考虑的内容。刚刚讲的竞争性合作，在第10工作组报告中提的是合作性竞争。到底竞争性合作还是合作性竞争？前后顺序颠倒将会产生两个意思。我认为我们

可以在这方面观察一下，不见得美国选择的是后一种意思，但是它使用不同的词，恐怕会有不同的想法。

第七，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可以评估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策的延续。比如特朗普采用的极限施压，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有继续使用的意图。这种极限施压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极限施压的两个特点非常明显。第一，不追求双赢。第二，极限施压不考虑最后结果。这才是关键。未来拜登政府如何使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或者是常规手法和极限施压的交替使用，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做思考。

最后一点，我猜测拜登政府未来的对外策略，大概是收缩与扩张并举。所谓收缩，拜登政府可能收缩技术和产品的管控范围，集中在对其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地方。至于扩张，在我看来拜登政府可能会设立不同的技术标准，进而对中国进行前沿技术封锁。我认为拜登政府的各项举措有着不同的优先级，尤其是疫情后要关注，拜登政府可能会重置优先级的排列，我们无论是外交还是经济

都会做一定的考量。我就是这些意见。

赵明昊：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我谈四个方面。

第一，最大的对手，这是无疑的。拜登政府是在世界处于重大拐点的时刻，去看待中国作为NO.1 对手这一角色的，其临时报告很重要，包括几次讲话，均强调了“拐点时刻”的概念。

第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拜登政府特别重视在两个方面的互动中去看中国。刚才邵育群老师的观点我特别赞同，我想补充一点，这一代的民主党想做很大的事。拜登说他要实施比罗斯福新政还要厉害的新政，他们有这种抱负。当然做得成做不成，另外一说。最近拜登政府强调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我认为这些变化我们应当要统一地看，对拜登政府的内政举措的研究深度还需要强化。

第三，竞争、合作和对抗三个要素的综合动态，以及相互融合的使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三个举措是截然分开的，哪些是冲突领域，哪些是合作领域，哪些是对抗领域，没这回事。所谓气候变化也会是一个竞争领域，甚至可能会出现非常激烈的竞争。因为拜登的雄心是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清洁技术超级国家。

第四，四个联盟建设。经济上的联盟、技术上的联盟、地缘战略上的联盟，最后就是民主价值观的联盟。联盟是划分阵营的手段，联盟的意义是更灵活的阵营结构。刚刚赵老师讲到同盟演变，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拜登政府目前对华政策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定调。定调是指美国要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拜登讲话中提到的正是激烈竞争，从英文来讲，是极致的、极端化的竞争。民主党这些人不是随随便便讲话的，他用这样的概念，有他一定的想法。

韦宗友：硬碰硬。

赵明昊：我觉得硬碰硬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胡华：我们外交部也回应了：我们也不在乎。

赵明昊：第二个是做局。做局指的是实力的定位。我们对这个词意见很大，但我认为我们跟美国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太一样。

韦宗友：这恰恰说明他内心心虚。

赵明昊：没错。当然这里面有俄罗斯的影响。我们不用太挑这个事。因为中俄都在讲，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第三还有控危。控危是指极力避免出现冲突。美国在台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还是在控制不要有热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这些人非常强调冲突的避免机制，他确确实实担心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战略企图。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提到 2026 年前中国要进攻台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互动具有很多的冲突性的特征，确实挺危险的。

最后我讲讲拜登政府在几个领域上的变化，是比较突出的变化。

临时性指南或任老师讲的过渡性指南的出台，实际上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战略和政策制定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沙利文先下手为强，企图以白宫国安会的优势地位主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过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是各部门分头制定，然后汇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的制定的程序、过程以及背后理

念的变化值得重视。NSC 现在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导向的一个机构。坎贝尔领导的印太部门是 NSC 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由于中国的因素渗透到了 NSC 各个部门、各个层面、各个层级，尤其是新任命的将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拉·罗森伯格。当然还有国防部的中国工作组。这个中国工作组不仅参与军事战略，也有搞气候变化、技术和能源的。

现在美国政府进行阵营化的手段发生变化，除了利用价值观问题，也利用台海危机问题。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基础上，设法将美日韩三边同盟做起来。因为台湾问题升级，不光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相关地区和国家，全球各主要国家都非常的紧张。澳大利亚最近新上台的国防部长达顿，是一个纯粹的鹰派，上任便提出了十亿美元的导弹计划。我们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另一个构建阵营的手段，是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我国的反制也跟上来了。我们对欧洲的制裁让欧洲各国有点懵。欧洲在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时，实际上是

做了一些处理，做了一些区别的。

面对美国的施压，欧洲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振。我们看到今年九月德国大选，默克尔的时代即将结束。明年四月法国大选后，我们再评估欧洲未来前进方向，以及其他国家的变化。刚刚乔老师也提到中美关系的联动性影响，我认为不要过度地强调美国的因素，要看到相关方内部的深刻变化。

最后一点，美方对中俄关系还是很关注的，特别是中俄发表了关于全球治理的若干声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杨主任在安克雷奇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受俄罗斯影响大一点？不知道。美国人对此颇为不解。我个人认为，围绕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而且我看到了特列宁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向俄罗斯提出了建议，主张俄美对话，希望俄避免卷入中美冲突，俄要保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这对于我们处理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也是有启示的。

郑华：我接着赵明昊老师讲，他讲的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

关于美国拜登政府内部谁在做决策的问题。我们感觉到，自拜登当选一直到他就职 65 天的记者招待会，拜登基本上不怎么露面，因为他一露面，说话就容易出问题，媒体就抓住他的小辫子。拜登现在确实有些思路不清晰，有点老糊涂了。因此，拜登轻易不露面，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原文我看了，我认为他说得比较清楚，尤其是有关中国问题的表述。

探讨拜登对华政策的时候，要想想美国内部的因素。无论是军政之间的矛盾，还是府院之间的矛盾，谁的话语权更大，谁在做决策，历任政府是不一样的。NSC 势力最强的时期是尼克松主政时期，主要是基辛格掌控。到了奥巴马时期，NSC 基本不起作用。现在即便是民主党党内，这些党内大佬之间的分歧也是存在的，这一现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体现了。哈里斯人称是迷你版的奥巴马，不离拜登左右，甚至有人说，她是来帮着看拜登有什么反应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是奥巴马的第三任期。这就是民主党党内现在的话语权归属。

大佬们谁的话语权更大一些，就折射在机构设

置上哪个部门的话语权更大一些，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比我们解读他的政策更为关键。小布什政府时期，军方的声音特别大，拉姆斯贝尔德、切尼等人的声音很大，而军方在奥巴马时期的声音却很小，没发挥特别的作用。因为决策和政策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出台了政策，也将面临执行问题。基层不执行，即使出台了政策，其实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只有监督执行，才有效果。有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出台，更多的是有一些象征性意义，这一点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学者要做的工作也好，其他国家部门要做的工作也好，可以以此来推测，到底谁在真正发挥作用，谁在党内更具话语权？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同盟关系的问题。

拜登几次讲话都提到，美国又步入了正轨。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冷战阶段，后来前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打成一团，而美国的盟友关系一直在维持着。其中关键点就是美国在提供公共产品。而苏联却要盘剥他的小兄弟们，包括对中国也是一样，苏联采取包括经济在内的多种手段，目的是从小兄

弟身上剥一层皮，最后盟友之间的关系就乱掉了。美国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基础维系了关系。现在美国经济下滑，是不是能够继续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来维护同盟间的公共关系？我赞成刚刚邵育群和赵明昊说的，它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不同的领域或议题存在不同的同盟，包括科技领域、经济合作领域，这种小的同盟相比于军事同盟更为灵活。

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时，将要面对美国在亚太的几个同盟。为什么说亚太同盟中，韩国是最容易松动的呢？因为中韩之间的贸易依赖度非常非常高。为什么日本与美国的同盟互动那么积极呢？因为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力非常小，中日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非常弱。那么澳大利亚呢？我们与澳大利亚学者交流，澳大利亚的学者们谈到，美国在亚太三个同盟体系中，韩国是最容易松动的，其次是澳大利亚，最坚定的是日本。日本对于美国的意义太重要了，涉及到两岸关系的问题，日本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看美国的同盟体系的时候，如果再用传统

的同盟关系来看，例如美国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同盟，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比如说前段的军演，为什么法国的战舰过来了？有一个关键点，法国的军售很厉害。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的军购中，法国是非常重要的，法国往东南亚国家卖武器卖得很凶，韩国也在卖。原先的同盟体系内，美国一家独大，而以色列也长期向外卖武器。国际军售市场群雄逐鹿，美国怎么摆平这种关系？同盟内部也有矛盾。我更关注的是刚刚邵育群老师和赵明昊老师讲的，小型的、基于某个具体议题的同盟，它更加灵活，而且是临时组建的，所以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三，在管控分歧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军工复合体。美国现在的防长往往来自于一个军火公司，此前他甚至拥有类似于总裁这样的职务，而且他安插在军方的几个重要官员，全都跟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美国要想销售它的军火，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挑动局部战争、局部冲突，包括反恐也是以割韭菜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情况下军工复合体的行动，以及和地区冲

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把控的。

现在我们认为拜登是弱势总统。但我认为我们中方的舆论宣传好像更猛了，比特朗普在位时期还猛。我们中方的媒体不要跳得那么高，不能因为拜登是弱势总统，好像中国就强了。对于传统的西方国家，也应当尊重自己的对手。他有一些外交信号，我们如果没有把握住，或者我们不做一定的媒体的诠释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人非常重视所谓的中国舆情研究。我们都要问，世界各国都说了中国什么言论，美国也是如此，也关注中国的舆情是不是总是骂美国。拜登放出那么多的信号，主流官媒没有任何一种善意的表达，或者是对拜登的这个 70 多岁资深政治精英的一种尊重。这让他不舒服。搞不好人际关系也就做无法形成良好的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因为拜登的岁数大，身体不怎么好，看着有点弱，轻视的言论便甚嚣尘上，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及时地捕捉到他们发出的信号，努力建构良好的关系。拜登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的是 **engagement**，就是要和中国接触。

第四，中国和美国两种道路、两个制度之争。

我仔细看了人类简史，一种是客观的，例如花草树木是客观现实。另一种是主观的，例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信奉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则我们将拥有制度优势，要将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美国人讲中国人权状况，中国怎么就不能出一本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非要美国替中国人出所谓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的人权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原先我们讲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口诛笔伐，中国为什么不反击美国的人权状况？按照逻辑讲，打败另一种想象秩序的方式，不是说他的不好，而是说自己的好，给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我们发展得也挺好。因为他说你不好，你就说他不好，打口水仗，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你说我不好，我说我自己挺好，这便有效地避开了矛盾的风头。换句话讲，我们用中国的媒体资源，用中国的学术资源，为什么不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更多地研究美国的不好，为什么我们不研究自己的好？我觉得这也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媒体宣传方面，我们可以换一种方

式，尽量避免和美国的热冲突，不能他骂你，你也骂他，这样的话，双方的矛盾攀升，攀升到一定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地爆发热战，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的。这就是我的发言。

冯绍雷：刚才各位美国问题专家讲得非常透彻。我比较赞同郭爱军先生讲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很重要，这三方面各有不同。梳理，我认为刚刚讲得非常透。评估可能有不同意见，评估应对更难一点。

我觉得中国对美政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中美两大国，哪里只是中国对美国，不是这么回事。至少是两对关系，一个是内部的发展跟外面的关系，另外是结盟。拜登特别强调结盟政策，对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是一个大的系统。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估，可以进一步看看整个国际环境、国际系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一定是美国人怎么说，而是整个国际环境、世界各大国际媒体怎么说。所以我说评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求教先贤，可以求教伟人毛泽东。接到通知，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毛主席老人家写的

《论持久战》，你们都知道当年汪老讲得很多的一句话，就是当年我们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一本《论持久战》，我们就干了，参加革命了，抗战了。这个就是动力，汪老他们不是一般的人，是交大的精英。今天来看，我简单说两条。

第一，对所谓的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现在对美国，从这个角度包括我们身边的情况，我觉得似乎两种倾向都还是有的。一种说，台海打一仗，现在就到打的时候，有点憋不住，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在讲。另外，比如对科技的竞争，好像世界决胜就靠 5G，拿下 5G 我就领先，有了 5G 我就是世界第一。有这种非常简单的推论。

阿拉斯加谈判之后，我们的一些专家，就说阿拉斯加一战定分晓，从此中美打成平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评论？好像就这样干下去，我们已经憋那么久了，现在就临门一脚了，就干一场，打倒美帝国主义了。特别是年轻朋友，我不是说年轻朋友不好，但是不是这样的局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包括一些老大使，在想是

不是还能回到八十年代韬光养晦的局面？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些朋友非常明确提出，对美交往就是我们主动的让步。让步倒不是不可以，但作为一个基调行不行？在当前的局面下能不能执行？

第三个包括中俄。有人对整个中俄关系全面批评，现在是非常尖锐的，认为由于中俄走得太近，导致了美国对我们的压力，俄国人干什么都在使坏，都是搞阴谋，这个舆论满激烈的。有时甚至无法说话，一说话就是老毛子拿了多少。没错，他拿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谁家里被拿掉不心疼呢？但你现在说这个，情绪很容易被挑动起来。

今天不是简单的类比，在处理两种倾向当中，有没有一种像毛主席当年基于持久战的立场出发，制定你的应对方案？我觉得这是关键。毛当年对持久战，分三段来看这个事。第一段是战略防御。你打不过人家嘛，日本人已经长驱直入，半壁江山没有了，这种情况下，你只能防御。我觉得我们目前有这个想法。拜登上台，气势汹汹，对你的出击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拉帮结派跟你干，来势很凶。

第一阶段，我认为如果能够这样类比的话，这一段我们肯定能够熬过去。问题不大，中国的国力在，传统在。尤其我注意到几个东西，最近几年我们的 GDP 总量将会超美国，这是许多研究报告的客观指向，无论是购买力评价还是其他的算法。这个力量对比放在那边，包括制度与意识形态。说实话，我们今天的观念和八九十年代的观念也不一样。大家把问题想得更加复杂了，尤其是一些长时段的因素在衍生。全球化三四十年代以来，比如说文明 *civilization*，这个因素上来了，这个上来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极有助推，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地理因素。实际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地缘政治正在重新回归，海洋性和大陆性。为什么又搞到跟伊朗一起，不光是俄国再加上伊朗，海洋性地缘政治是中断的，大陆地缘政治的特点就是相互关联，紧密关联。这里面两种力量的博弈，包括长时段的因素，包括气候因素直接成为话题。我觉得第一段不难熬，熬着过去，虽然压力很大。

战略相持是关键。战略相持阶段可能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对美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把自己

内功练好，先管好自己。这些问题都有先例在，美国起来，一个是罗斯福新政，就是凯恩斯主义，实际上他还受惠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他不这么讲，实际上受到了这个启发。当然不是说搞了社会主义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实行凯恩斯主义，美国国力强盛，打赢二战，真正成为世界霸主，是从内政开始。美国最新一轮的所谓的膨胀，是在七十年代末。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化，这一轮也是从内部体制开始，牵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牵动全球化，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内政的入手是大国成长中的关键。我就说一句，我们党的文件历来强调，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关键，这就叫自我革命。我们文件都写了的，文件写了要实行的。2035 的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什么？年均 GDP 增长是 4.7%。每年要达到这个水平，没有体制改革就无以激活各类要素。经济专家今天都在，这个情况是很显然的。我们做好内部的工作，涉外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来，我们排兵布阵少不了。这是我最关键的想法。

到了第三阶段，我们总会较量一下，比试一个

高低。关键看你拿出什么样的模式，不是我压倒你，或你战胜我。面对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高处不胜寒，真的做世界老大，日子不一定好过。今后的世界秩序的模式是什么？彻底的自由国际体制还能实行吗？困难。真正的所谓的多极化，中俄行不行？有困难。我倒是注意到有一种观点，回到维也纳体系。

第一维也纳体系是恩格斯所说的维持欧洲百年和平最主要的背景。

第二维也纳体系是大国协同、大国协商。它并不是确定一个联合国体制，因为看下来，尽管我们说加强安理会什么的，空的，做不到。联合国就是大国聚一起开开会，我估计这种以后越来越困难。

第三维也纳体制的实质不是所谓和平民主论，不是民主国家才能维持和平。这些君主立宪，甚至专制国家在一起，难道不能达成和平吗？这样一个多元协作模式的确定，尽管目前看起来还很遥远，但你不要小看你的模式会影响当下。我们不是为了当老大，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大家协同和谐的国际体系，而且是有逻辑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说可能

就像毛主席跟日本人打仗，有阵地战，有运动战，大量的靠游击战，不是正面对抗，而是侧面迂回，大敌当前办法多了。

胡华：重学马克思主义，重学毛主席著作。分析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马克思主义观点。

冯绍雷：要看是什么样的马克思？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研究马克思手稿十四年。他认为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说得客气一点，有待大大提升。

乔依德：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我受了很多启发。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立体了，或者是看得更全面、更立体。我补充几个问题。还有我们的对策，我也想根据大家的意思讲几条。

第一，是刚刚提到的，到底美国内部谁在决策？这个当然一下子不好讲。但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拜登跟他的团队好像在对华政策上，至少在语序上面不完全一样。拜登在各个场合讲得还是比较客气的，讲话是比较平的，包括跟习主席打电话两个小时。但他下面的团队都是讲得比较硬的。拜登

个人风格跟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就是你必须要听他的，比较强势，拜登是不强势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而且现在他要把哈里斯提上来，这可能有很多的解读，一个是怕拜登身体不好，半当中做下不去，还有是为下一届大选。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要观察。

第二，我觉得，这两个多月以来，美国各方面的声音是比较多的。特朗普时候的气氛使得你几乎不能讲，一般随大流的人很多，除非有一些特别硬的人。最近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的很多，不完全是跟建制派一样的。3月23号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那篇文章，我不敢讲他代表了很多，但至少是一个声音，他认为：现在在国际秩序在一个转折点上，西方完全主导不行了，需要新的大国的协商机制。他特别提出六个大国，就是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G20和联合国太大，没法协调。但这个能不能做成，也很难说。

任晓：这只是边缘的观点。

徐明棋：欧洲人首先反对。

乔依德：是，里面涉及很多问题，不容易做到。

现在还能提出来，特朗普的时候，这种声音基本上很少。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这些，不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知识阶层都对现在的局势比较关注。因为大家知道，中美关系，包括地缘政治，实际上不但涉及整个国家的命运，也或多或少涉及到每个家庭。前两天我跟一个人吃饭，他说他儿子在美国大学读二年级，现在不知道以后到底怎么办？是在美国待下去，还是回到中国呢，现在都搞不清楚。

我们自己也要有比较全面的，比较政策的东西。既然不是要毕其功于一役把美国打下去，你制裁我，我加倍制裁你，这是否一定是一个好的战略？我觉得要考虑。我坦率地说，我们自己的各个部门是否协调？我们自己的战略和战术是不是都很协调？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进一步考虑的余地的。

刚才也讲到了，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是可以有手段的。我觉得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因为我们也私下了解了很多，搞投资的、搞制造业的，现在就是仿造药都没仿得很好的，还不如印度。我很担心，最高层如果单看一些数字，觉得我们很厉害，其实有好多东西未必如此。我们知

道很多具体的案例，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手机上的贴膜，这个贴膜不是马路上的贴膜，生产这个机器全世界就两个工厂，一个日本，一个在中国，但实质上很多东西是装配的，零部件是从日本、台湾地区进口的。如果上面不知道，过分看高自己，这很危险。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政协最近请了原来的工信部部长苗圩，讲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是第三梯队，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

我们对美国定位，还有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哪些是可以的，哪些不完全准确，我们要评估。当然我不是说国外的媒体是公正的，它们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我们自己也要有考虑，既然我们疫情控制好了，我们的疫苗出去，别人应该是欢迎的。但为什么别人反而对你有意见？当然，外面有一部分是出于偏见，我也认为国外有偏见。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要看到，你在外面讲的话，有些东西是引起别人反感的。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自己对美的总的战略方面，恐怕还是要再考虑。战略内部要有一致性，战略跟战术也要有一致性。

冯绍雷：插一句话，刚刚赵明昊提出了俄国的

问题。

第一，托马斯·格雷厄姆是美国深度决策人物，负责俄国事务，他的说法是第一对手就是中国，这个局面已经清楚了。

第二，再也不可能有历任的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的 **reset**（重新设定），这个不可能了。

第三，俄国人的战略非常立体。普京最近两年讲了几次，中俄现在不结盟，今后大家发挥想象力。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中俄不会结盟。这个话非常有弹性。另外一面，发掘中俄合作的潜能不封顶，我觉得这句话要讲讲，这两面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俄国人现在的心理状态很矛盾、很复杂。公开场合一般是强调中俄合作不会动摇。看中美冲突，他认为你们的水平还不及当年的冷战，你们水平低了，我们不参与。不参与下面有一句话，我们要当新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这是公开讲的。

胡华：梳理、评估和应对，我一直在想谈什么。今天学到了很多東西，开拓了思路。我基本的观点，接着刚刚乔老师讲的，我感觉还是要多观察，

深度观察。为什么？我最近有一个强烈的体会，我们最近在筹备乒乓外交 50 年，4 月 10 日要搞一场中美乒乓联赛，4 月 30 日要开报告会，我们要为会议提供一个材料，就是乒乓外交到今天的中美外交 50 年大事记。梳理过程中我非常有感触，特别是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比如说围绕中国能不能无条件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当时美国国内也很复杂。当时我虽然在一线，也不了解这个背景。克林顿政府跟国会、政府部门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克林顿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哪个部门是在决策中有发言权。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老实讲，我们现在对美国国内情况的了解是很少很少的。反过来，我们对中央决策层对美的基本战略，我们也了解得更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智库的人，还是要多观察，在观察到一定的时间，我们再写一些报告。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我们多做具体工作。特别是我们这种小智库，发不了什么大声音，要多做具体的工作，多了解情况，多交朋友，多加强沟通，还有多做地方

交流工作。

第三，中方端正心态。对美国出台的一些东西我们怎么看？要设身处地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美国提出竞争、合作、对抗，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这个战略对美国来说有没有道理？而不是教育美国要端正心态，中国在崛起，你要适应这个形势。反过来美国提出的对华基本战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多观察，围绕这些节点，多开这样的业务务虚会，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分析，还是很有帮助的。

张建松：我正在做一个调研，也是上面布置的，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趋势。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如何避免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陷阱，意识形态的对抗有哪些燃点。另外就是开展党际交往，尤其是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往。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往中，要建立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建立健全交往机制。现在我们关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趋势，海外我们也在调研。对于我们来说，研究意识

形态对抗有哪些燃点和爆点，新疆、西藏、香港也是这样，以后怎样做到把他们的一线问题避免掉。

乔依德：我们可以讲精准扶贫，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我们党和国家比较关注贫富差距。你就讲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来看，当然这个是很难照抄的。另外还要注意，现在西方（包括美国）讲的社会主义，跟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完全一样。不要听人家讲社会主义，我们就以为人家认可我们，这不是一回事。但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关注民生。现在有些东西，不敢讲别人是来学我们，但确实他们对有些东西不那么反感了，比如说产业政策。西方以前说产业政策是完全不对的，应该全部是市场。现在他不会说中国好，但实际上也在慢慢做。

胡华：新华社这个题目，你要分析一下，现在国际上有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是不是成为运动了？第二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社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单纯讲社会主义，我们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有哪些特色的东西？刚刚乔老师讲得非常好。贫富差

距、抗疫都是最说明问题的。

郑华：疫情前我有一个学生在嘉兴外办当主任，他们说中央给他们的一个任务是政党外交。嘉兴也是鱼米之乡，经济发展好，又有红船精神。让他们接待外国的政党。他就来问我，说郑老师，政党来我们这儿学习社会主义，讲点什么？其实就是乔老师讲的，你如果要划一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标签，其实人家不一定好接受。你给他讲实实在在的定点扶贫、经济发展，怎么成为全国百强县（嘉兴有好几个全国百强县），全民医保，产业怎么发展，法国蜗牛很多都是嘉兴那边出来的。最后回归到我们希望老百姓都富裕，减少贫富差距等等，这样人家更容易接受一些。如果每场讲座都是画一个社会主义的标语，人家就不好接受。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全球都有政治冷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乔依德：那么我们的会议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包道格 (Douglas H. Paal)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

系列座谈会第 63 期 2021 年 4 月 1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包道格先生来与我们分享他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的看法。包道格先生目前是亚洲项目的长期常驻学者，以前他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我们很高兴听他分享观点。今天，距离拜登政府上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现在是我们审视其中国政策的时候了。我先向包道格先生提出几个问题，然后我将开放问题给其余参与者。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你同意吗？你能否简要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要点？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我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今天

上午的参与。对于这次谈话，我期待着你的问题和评论。拜登只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吗？我不这么认为。特朗普塑造了这种环境，这也是拜登必须应对的环境。尽管拜登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参议院和副总统职位上负责外交事务，但他是个受国内利益驱使的人。和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一样，拜登认为特朗普为他提供了操作的限制。但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他仍将努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并考虑国内问题的结果。他很早就宣布，他将花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审查中国政策。首先，这让他可以避免共和党人的批评。第二，这给了他时间，评估在制定自己的中国政策方面的机会和风险。我认为你们应该把这当成一个评估期。

乔依德：自从竞选开始，拜登和他的团队就主张他们将联合盟友日本、欧盟等来对付中国。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他们成功了吗？

包道格：与特朗普疏远盟友的做法相比，拜登试图与美国盟友重新团结的任何做法都是成功的，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成就。日本首相明天将抵达华盛顿，他将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位外国访问者，这对

日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欧洲人也相当高兴，他们得到了更好的对待。日本，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政策有不同的做法。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强调这些差异，他们希望恢复特朗普所造成的损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看到盟国之间的微妙差别和分歧，包括如何应对中国的观点。我认为欧洲人，日本人以及印度人会试图影响美国人对这场竞争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为拜登提供咨询的人，以及中国在这方面的战略目标，都非常有限。他们并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与盟友、与中国的互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将迫使他们在制定政策时更加具体和长期。

乔依德：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戏剧性的开幕，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各种评论。你能分享一下会议的内部情况吗？你怎么解释？

包道格：我认为双方都有国内需求需要满足。以我和杨洁篪主任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如果你对杨主任说了国务卿布林肯说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的答案，无论是 10 年前，2 年前，今天还是明天，杨的反应就像受到挑衅一样。布林肯在镜头前玩了自己

的游戏。然后他们开始谈正事，在那之后开始私人会谈。我对第一次会面不太满意，我很高兴他们开了个会，他们彼此友好是件好事，但双方还没有真正听取对方的意见。他们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对中国不理解拜登不会道歉或纠正特朗普的做法感到失望。特朗普做的，就是特朗普做的。拜登是个新人，他们应该接受有新的团队了。与此同时，拜登团队必须意识到，如果只是重复特朗普，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双方都需要向中间靠拢。我对此并不乐观。我希望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改善这种情况。第一次会面几乎没有正面影响，但正面影响还是大于负面影响。

乔依德：谢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众所周知，至少在中国看来，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拜登政府似乎仍在使用它作为对付中国的一张牌，从我的理解来看这很危险。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阶段？

包道格：让我非常直接地说，我不认为拜登的人把台湾当作对付中国的一张牌。我想他们明白了，那是一张不确定的牌，不是一张有价值的牌。

他们试图加强与台湾传统的密切关系。政治人物与他们的朋友保持密切合作，他们在个人和政治上都是台湾人民的朋友。但他们希望台湾人民明白，这不是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是复杂的，他根本不在乎台湾，他不在乎那是不是一张牌。但他政府的人这么做了，蓬佩奥在担任国务卿期间，还有其他几个人，试图用台湾作为刺中国的矛，这是不明智的。我认为拜登的人实际上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他们不会玩利用台湾对抗中国的游戏，他们对此感到担忧。台湾得到了明确的信息，即不要引起事端，从而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不明智的行为和成熟的冲突。

今天，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访问了台湾。多德是拜登长期以来的好朋友，过去也经常参与台湾事务。我想，他们在那里会面并不是要告诉台湾：去吧，做我们的牌。他们的会面是为了告诉台湾：不要再关注特朗普和蓬佩奥了，要关注拜登，他是现在的总统。没人在公开场合这么说，这是我的解释，我认为我没有错。台湾继续将

特朗普时期视为理想时期，但他们告诉台湾，拜登是镇上的新警长，就像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说的。现在是台湾觉醒并承认拜登为总统的时候了，特朗普走了。

乔依德：大概二三年前，你在告诉我在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第一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直截了当地告诉特朗普总统，台湾是一条红线，你不能越过，特朗普似乎听进去了。从我的观点来看，去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被逼到了角落，不得不对台湾采取强硬立场。

包道格：我想去年发生的事，在写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证明在 2020 年 3 月 COVID-19 疾病开始了。特朗普没有有效控制住疾病。纽约的医院人满为患，许多患者死亡。他没有办法对付这种疾病。然后他试图指责中国。那时，他们解除对台湾的限制，因为特朗普要把自己从无力应对 COVID-19 造成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乔依德：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议会即将出台的《2021 战略竞争法》，它很可能会成为法律。这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这是新冷战的转折点吗？

包道格：关于立法草案的条款有许多不同观点，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民主党很可能在参议院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如果他们能得到 60 票，就能使这个法案通过。他们必须适应某些强硬路线、共和党人的情绪以及民主党自己的强硬态度。我认为我们的立法机构最广泛的共识是，花钱让美国更有竞争力，还有限制技术转让等。政客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当涉及到提供资源以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加强研究和开发，这样的事情会通过，并带有相当多的钱。这真的是一大笔钱吗？我想宏观经济学家会说这是一笔小数目，500 亿美元对美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以比较一个大公司在它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花费。我们将看到立法程序是如何运作的，会有结果的，但内容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立法主要是对国内产生影响，而不是直接的双边影响。

乔依德：近日，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在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协调机制，他明确指出该机制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六个成员。你认为这是可行的办法吗？

包道格：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现在有很多人在提出这些想法，他们来自欧洲的背景，特别是来自剑桥或牛津大学。他们没有表现出对东亚的理解，经常把亚洲当作二战后的欧洲。他们真的不了解不同的文化，不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优先事项。在这里，就像欧洲一样，是相当理想主义的。我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仍在经历冷战后全球化的崩溃，全球化过于扩散，许多国家无法忍受。由于经济和大流行病的压力，这些国家正在关闭它们的边界，而不是开放它们的边界。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有一个大的宏观政治管理结构。它不会是北约，而是像理查德所谈论的某种方式。但从现在到那时，我们必须经历所谓的巴尔干化过程，我们将会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障碍、资金流动障碍。在这段时间内，互联网将变得更加有限。从长远来看，我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将尝试回到一些更普遍的方式。但现在的方向是，不那么全球化，也不那么普遍的方式。

乔依德：好观点。下一个问题是，现在，反华

似乎是美国人民的共识，或者至少是两个政党的建制派，这已成为他们的一个惯例。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你能举出一些主要的观点吗？

包道格：我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南海或台湾海峡或中国解放军的发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收入和工作的减少，这被认为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中国的利益。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对美国政治持批评态度。美国的政治阶层很快就通过了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一些协定，这些协定实际上给美国带来了财富和机会。它对非竞争性产业产生了非常痛苦的影响。而政治阶层没有照顾这些人。他们有所谓的贸易调整援助，这是可怜的，是不够的，没有解决这些问题。20年后，美国人看着政治阶层说，你们辜负了我。我想这就是问题的根源。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很有根据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允许金融或高科技领域的公平竞争，在中国不能用谷歌等等。然后再加上所谓的黑客窃取个人数据，所以变得非常个人化。最后，说 COVID-19 是一种中国疾病。人们认为中国会以某种方式打败美

国，无论是经济上，军事上，还是疾病。我们有很深的共识，对中国非常怀疑。改变不是不可能的，但改变并不容易。

乔依德：另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关于美国的收入平等。

包道格：这是我对拜登政府的一种挫折感，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些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他们明白我们必须照顾美国工人，应对技术变革，更重要的是解决就业，全球化也有很大的影响，以及全球贸易协定。拜登政府决定不再签订贸易协定。对此，我的回答是“不”，不是不需要，而是需要更好的贸易协定。必须为每个人创造越来越大的蛋糕，不能让缩小的蛋糕成为答案，因为缩小的蛋糕是无用的。我很沮丧，因为我无法让我的朋友和拜登政府解释未来2到3年我们将走向哪里。因为世界竞争和冷战是一场军事和经济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场军事竞赛。冷战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上的，军事的重要性要小得多。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美国人一直关注着伊朗、阿富汗和伊拉克，现在是中国。我们要了解未来的力

量将来自于经济政策、社会研究、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政策，这些会加强全球经济表现，帮助提高美国与其他地区的人们以及其后代的生活水平。

乔依德：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可以站在中国人民或中国政府的角度，就如何应对当前局势，保持甚至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一些建议？我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非常重要。

包道格：我想我刚才谈到，中国继续等待拜登纠正特朗普的错误。我认为，一步一步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来，会更有成效。对于中国，可以从恢复学生签证流程、重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开始，让在特朗普领导下失去正常的事情正常化。中国的官方姿态是，要拜登政府先来改变这些东西。如果中国想要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展示自己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方式。此外，强调军事能力，大型阅兵，展示军事力量，这对局势没有帮助，现在是安静的好时候。我知道中国领导人必须表现出对军队的领导，他们想展示过去 150 年的历史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但也有其他观众，必须注意传达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我

认为这会有所帮助。还有很多的事情，中国可以在网络方面合作，通过控制流行病主动与美国合作。向拉丁美洲、非洲传播疫苗，不是竞争，而是合作，那就更有意义了。

乔依德：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哲学是中庸之道，你必须一步一步地来，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感谢。我想我会尽我所能传递你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好的。

现在，我该向与会者开放发言了，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问题，无论是口头或是写出来。

查道炯：我想问包道格先生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双边贸易施加关税的前景。你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这会发生什么调整？

包道格：拜登身边的政策顾问所做的愿景与特朗普完全不同，他们对自己在全球贸易政策方面的发展方向缺乏远见。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特朗普瘫痪的组织。现在，是时候对组织进行改革，使其更加适应当今的挑战和数字经济、国有企业等，这将非常强烈地牵涉到中国，以及世贸组织在关税问题上的其他各方。即

使是在努力促进美中关系平稳发展方面非常突出的人士，如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表示，美国不应同样取消关税，我们应该系统地做这件事。

在第一阶段结束时，一年前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有条不紊地开展这些工作。我们很快消除了与欧洲的关税竞争。我希望在这一审查期结束时，如果有一项贸易协议达成，我们就会退回很多关税，特别是那些伤害我们的关税。朗普的关税政策都是失败的，不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现在是时候调整关税政策了，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的需求，并希望能带来一些明智的交易。

张锐：包道格先生，我认为这里的人，以及中国和美国的人，都在谈论台湾地区战争的危險，我们听说一些将军甚至在国会作证。客观地说，你觉得风险有多大？我们说的是未来3到5年。

包道格：我认为发生蓄意冲突的风险很低。我不认为中国在试图强迫统一，中国是试图阻止独立，这是不同的目标。阻止独立是更容易的，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是这样认为的，即使在台湾也是如此。我认识蔡英文很多年了，她有很多想法，但

她不是一个追求独立的鲁莽的领导人。有人可能会说，存在着发生意外的重大风险，可能导致流血或发生冲突。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地尝试建立预防危机的机制，设法进行危机管理和危机预防。幸运的是，即使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双方的国防部之间进行了相当定期的会谈，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听到了关于中国专家方面的讨论。我觉得很鼓舞人心。他们在谈论深化和扩大我们所拥有的危机管理工具。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也许不是现在。在这个最初摆出姿态的过程中，拜登政府觉得他们的态度必须被中国视为强硬，中国领导人相对拜登政府也不能看起来很软弱，所以他们经过了几个月的强势态度交流，这就是意外可能发生的时候。但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相当保守。蔡英文也相当保守。我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迹象。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视察了福建的商业企业和文化场所，没有参观军事设施，没有使用强硬的语言，而是谈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信号，

表明中国并没有试图发出恐吓和冲突的信息，尽管中国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关注台湾 2024 年的选举，可以看到是否有人当选后更强烈倾向于追求独立。我认为台湾人民很明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这将在下一次大选中得到检验。

陆丁：我的问题是，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技术脱钩，拜登政府仍然会进行吗？如果是的话，会怎么发展，你可以为中方提供什么建议么？谢谢。

包道格：我想我们会看到有人在高科技领域继续这一政策，直到人们确定技术可以重新回到美国或在其盟友的安全的手中。但我认为，在过去一个月里，这种脱钩被夸大了。如果你看一下投资流动，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一年里实际上有所增加。过去一年里，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是大幅增加的。我们看到的很多脱钩现象，我想说的是，有些是过长的供应链需要缩短，或中国的生产成本太高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需要非常有鉴别力地描述。一般来说，企业并不急于离开中国。你可以看到，在本周举行的与

美国商界领袖们的会议上，他们正在努力发展在中国的投资和市场份额。

孙珺玮：我的问题是关于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你对此有何看法？我认为，仍然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如何传递，到什么程度，如何提供资金等。你如何看待这种新的矛盾对提高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影响？谢谢。

包道格：100 个不同的参议员和 435 个不同的国会议员必须聚集在一起，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写进法案。其中有许多我认为不应该成为法律，还有一些空洞的东西不应该成为法律。基础设施法案，正如我所阅读的原始草案，我认为还不够有雄心。在关注高速铁路的同时，重点修复现有的桥梁和道路，这让我想起了全球金融危机后 2089 条打包的议案，我们花了很多钱来修复现有的基础设施。但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新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新的机场，新的桥梁和新的高速公路，新的铁路，新的地铁，但都没有实施。在非常拥挤的城市里修建高速公路是不够的，它看起来更像是为当前工作所设计的合同，很容易履行，却不

是给他们挑战，让他们走出去，建设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先进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个人对它的的天。有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钱不算少，但并不令人印象深刻。然后有很多钱可以用来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把钱花在黑人、拉美裔或其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服务的美国人的地方。在我们的社会巾存在着种族之间的天，它并没有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快地变好。我认为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天并不是通过在巾建桥梁和道路就能解决的，尽管这可能会有所帮助。在他们通过立法程序的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将会瓦解。如果你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国会过度开销，我们将在未来几年在这些项目上花费我们所没有的钱。昨天我和我的股票经理回顾了我的投资组合，他鼓励我留在股票以及权益市场，因为收益会上升，经济将会燃烧很多额外的“燃料”而热起来。它看起来像一个非常热的经济。拜登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可以保持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天多数席位。这似乎是主要的动机，而且很有可能实现。

孙珺玮：谢谢。你认为中国公司在基础设施方

面有没有与美国公司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包道格：我对此不乐观，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美国在这些领域没有竞争力。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问题，例如当波士顿或华盛顿建造地铁时，环顾世界，意大利的企业不再竞争，德国企业也丧失了竞争力，但中国企业非常有竞争力，因为中国利用其封闭的市场实现了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塑造。如果中国不允许在中国内部进行有效竞争，那么继续允许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就会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我认为你会发现一个适用的规则：如果基础设施的供应商，其相关的能力和技术是不开放和竞争的，那么他们将不被允许在美国市场上竞争。美国人认为市场中最好的元素是允许真正的竞争。如果我们有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中国可以在那里争斗。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动力充沛或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经济体，它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适当的竞争政策。我宁愿看到我们的争斗发生在那里，而不是纠结于如何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做贡献。

邵宇：谢谢。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第一，关于中欧投资协定，你怎么看？中国可能在未来 5 年内加入 CPTPP 吗？

包道格：看来我们所做的制度安排并未让我们受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也不会在其中赚到多少钱。美国不加入美国倡导建立的组织，因为目前来看这一协定仅仅是供应链便利化协议。但美国仍需要回到 CPTPP。特朗普的言论使 CPTPP 在美国名声不好。过去的 20 年来，我们的谈论更多集中在宏观政治层面，没有关注普通美国人的需求。拜登政府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它的政策与关注点并未向普通民众阶层延伸。除了在二战后不久的时期，我印象中美国再也没有主导推动开明的贸易政策、拓展全球商业、提高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收入。现在我们需要对贸易带来的机会进行概念上的洞察和理解。由于历史上国内政治原因，美国没有正视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花 6 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如果我们不回到最重要的位置，那对我们是致命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与欧洲签署了投资协定。中国也与包括韩国在内

的多个国家进行了谈判，韩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但韩国暂时应该还不会走得太远。美国没有参与其中任何一项协定。为什么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能同时参与，一起签订协定更开明的贸易政策呢？这些国家的政治目标均没有有效达成，特别是美国。我们不现实地处理未来竞争的来源，我们应当着力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不是军事和战略领域。

邵宇：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目前一个非常棘手的事，美国如何看待日本的核泄漏问题，日本将如何处理核废料？对于这个问题你是什么看法？

包道格：我自己的看法与美国政府是一致的。我认为，美国政府的选择受原子能机构研究结果的影响，就像在抗击大流行病中一样，遵循科学，而不是政治。每当你谈论核问题，听者总会有所忧虑。福岛危机给大家重要的教训，包括削减开支和核燃料的危险。我仔细思考了关于废水处理的挑战。人们说，不应该对日本或日本以外地区人民的福祉构成威胁，但这绝非易事。因为人们都很害怕这些，好比哥斯拉就是从海洋中冒出来的弗兰肯斯

坦怪兽。在这次处置中，中国也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越来越依赖核能。使用核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废物，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巨量的核废料。我希望中国不只是在旁观中获得乐趣。日本政界人士现在处在外界的批评之下。也许有一天，中国政界人士也将面临因如何处理中国核副产品而来的批评。

赵广彬：我的问题是，中国投资者能不能继续投资美国？

包道格：重要的是，国会提出的新立法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增加人员和行动范围建立了一个强化机制。当我阅读相关法律条文时，我认为它确实不会影响大多数证券投资，但它可能会影响他们所关注的投资人。最近的例子是中信证券在美国收购了一家通用食品补充剂公司。这家企业的产品很受年轻人欢迎，他们服用这些药丸会感觉更强壮。这家公司有数千家分店，我印象中大概有 830 家分店。实际上，美国军方也突击审查了它，但没有施加任何限制。这在未来可能会更难。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标准投资、组合投资和收购将在美国保

持开放，投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触及安全问题。我再重申一遍，中国在这类事情上没有开放，例如股权问题。如果中国不开放，美国就不会更开放。如果不能保证开放，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关系和投资，美国国内会有很强的反对声音，国会将反映这一点。

赵广彬：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预测是什么？中美在未来 4 年甚至是更远未来的关系将会如何？

包道格：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美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稳定。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的种族冲突正在下降。但目前的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些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有效地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竞争或合作。所以，美国目前第一件事应是使国内的优先事项得到有效处理。

现在，一位来自美国偏远地区的 78 岁的政治家当选美国总统，这对拜登是一个重大考验。他的顾问们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他自身的政治基础也好坏参半。我们的国会近几十年来没有受到什么

影响，现在各方需要团结起来。美国在 70 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中度过了艰难时期。80 年代，我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我们的能力感到如此悲观。我不认为美国人愿意团结。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论点：我们应该让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用敌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有些人是这样相信的，但这一观点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现在问题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重大的发挥领导力的时刻。现在，如果我们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对公众说真话，这将是有帮助的。

例如，加州的移民问题。人们对过度移民或不受控制的移民感到非常不安，但移民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中国将在 2035 年遭遇人口断档的问题，而我们不会。但我们对移民也有歧视，我们应该给予有更好教育背景的人特权，那些有我们需要的技能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新需求的人。我试图寻找拉丁美洲移民问题的起源，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失败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将人民送到海外，因为他们的人民不能忍受与其中的一部分人生活在一

起。我们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政策，而特朗普试图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能够保持人口结构优势的前提下，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为某些环节制定一些标准。我们必须向未来在美国辛勤工作的美国人民保持开放。

乔依德：如果没问题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结束了。包道格先生，你的观点给我很多思考，我很感谢。

包道格：与你交谈总是很开心，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上海或圣地亚哥见面，并更深入地交谈。谢谢，晚安。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

马骏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4 期 2021 年 4 月 1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的视频会是我们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共同举办的。我们这次沙龙，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马骏先生，给我们做关于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的演讲。在座各位对马骏应该很熟悉，他也是我们基金会的好朋友、老朋友。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他现在是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共同主席，以前叫 G20 可

持续金融研究组，最早也是我们人民银行和英国央行共同组建的。前一两年停下来，今年意大利是 G20 主办国，他们提出来要继续搞，还要把它升级，现在中国和美国是共同主席。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马骏是我们国家绿色金融的一个开拓者、先行者，他从头到尾一直参与。对我们来说，机会很难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协调。下面我们欢迎马骏先生给我们作演讲。

马骏（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特别感谢乔依德老师精心安排这次晚上的讨论会。不光是感谢上海发展基金会，也感谢泛海国际金融学院作为共同的主办方。刚才乔老师特别讲到 G20 的可持续金融小组，这个小组还是有一定历史的。大家可能记得 2016 年中国是 G20 的主席国，当时我们提出以绿色金融为主题，形成全球的共识。从 2016 年到 2018 年，中方和英方作为主席单位共同主持了这么一个 G20 小组，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绿色金融方面的全球共识。后来，部分原因是美国不感兴趣，因为美国

前几年退出了巴黎协定，这个小组就没有延续。今年，意大利作为 G20 主席国，他们主动提出要恢复 G20 可持续小组，而且要求中国和美国担任共同主席，这里面有极为微妙的含义。中方很快就答应了，美方经过三个礼拜的考虑，也答应了。所以过去几周，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易纲行长再次任命我担任这个小组的共同主席，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一起来制定今年的议程。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中，已经形成了四项基本共识，准备作为今年的四项重点工作。第一是要制定 G20 的可持续金融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会覆盖未来好几年 G20 和国际组织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框架。第二是关于推动可持续披露标准的一致化。第三是要推动关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的一致化。第四是要进一步发挥 MDB（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多边开发银行）在落实巴黎协定当中的作用。我在下面的演讲中，会提到国际合作的具体内容。

我想花大概 45 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说说几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是碳中和的缘起，我们为什么要承诺碳中和。第二是碳中和带来的投资的机

遇。第三是碳中和过程中，我们将会面临很多的风险，尤其是转型风险。第四是监管机构能做什么。第五是金融机构能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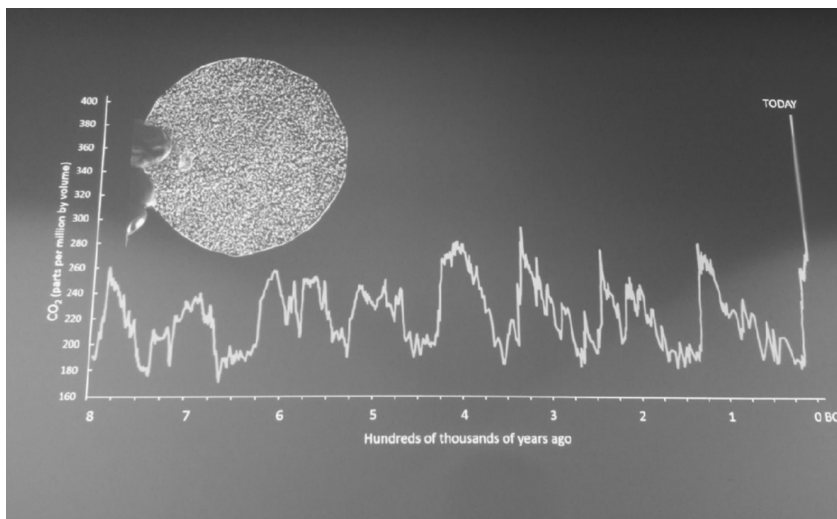


图 1：全球碳排放近百年大幅上升

关于碳中和的缘起，我们一定要讲碳排放最近 100 年的轨迹。图 1 是英国的科学家用模型测算出来的，过去几十万年碳排放的轨迹。最后那根柱子就是过去 100 年飙升的情况。碳排放大幅度上升，已经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全球气温上升。

图 2 从北到南，颜色不断由深变浅，最深的地方在北极的附近，在最近 100 年中北极气温已经

上升了 4 度，再往南，上升 3 度、2 度、1 度、0.5 度。全球平均已经上升了 1 度，1 度是什么意思呢？巴黎协定的要求是，从工业化开始到终极目标，总共上升不要超过 1.5 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用掉 1 度了，剩下的 0.5 度给我们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能够排放的碳总量是非常有限的。全球在地下所藏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源，恐怕只有 30% 的化石能源可以被燃烧，还有 70% 是永远埋在地下不可以被燃烧的，否则气温就会超过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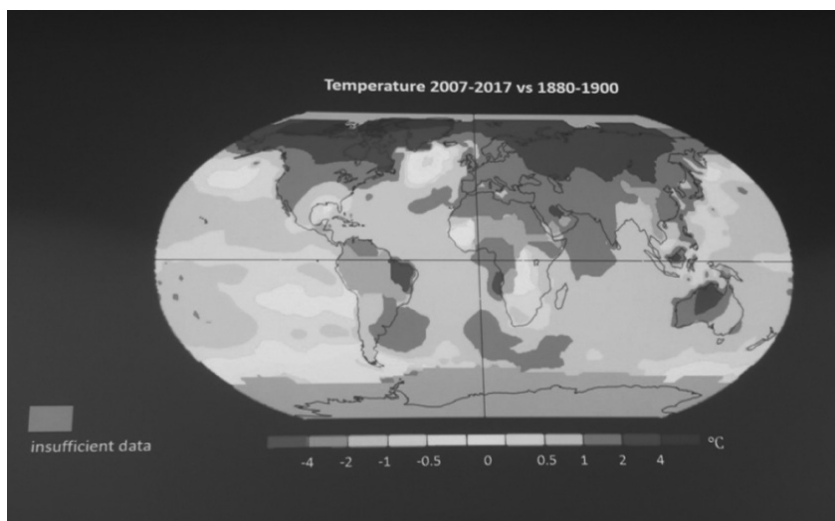


图 2：近百年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 0.5-4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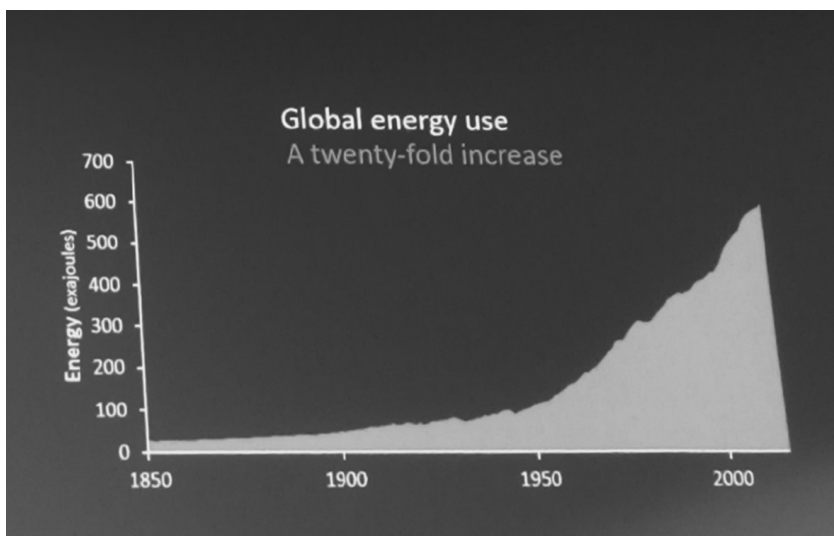


图 3：过去百年中全球能耗上升 20 倍

导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而导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图 3 表明，在过去 20 年中全球能耗已经上升了 20 倍，就是说我们所燃烧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在过去百年上升了 20 倍，是导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气温变化的势头不受到控制的话，会有很多恶果，其中一项就是海平面的上升，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很多国家的沿海地区被淹没。如果按照目前的轨迹继续增加碳排放，北京地区要被淹掉，上海地区被淹掉了。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话，据一些科学家

的估测，全球可能会出现 10 亿的气候难民，这 10 亿难民就是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无家可归的人。大家知道，沿海地区往往是一个国家物业和其他资产最值钱的地方，因此海平面上升也会导致非常大的金融损失。几年前，有一个机构叫 ERU，做了一个测算，说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这种物理风险，可能导致全球 43 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这个损失相当于全球金融资产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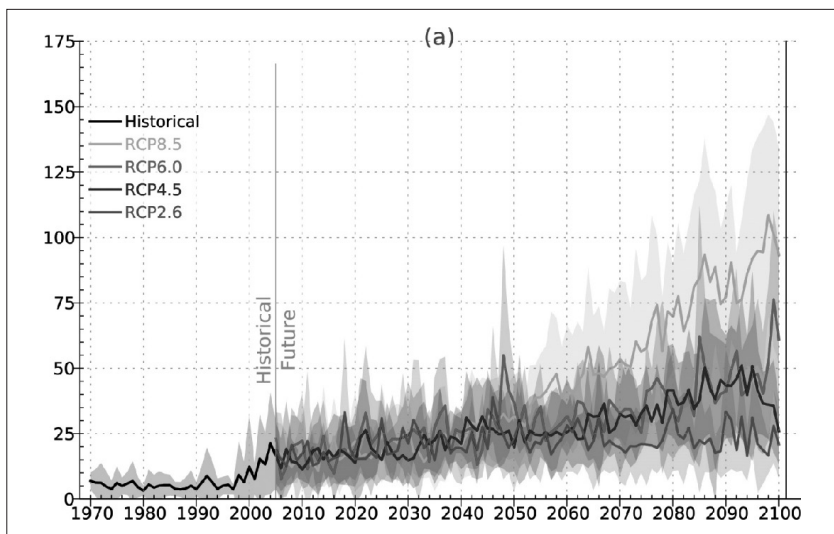


图 4：其他自然灾害概率上升的情景

除了海平面上升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灾害会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包括洪水、干旱、火灾、飓

风、台风等。举个例子，洪灾受灾人数现在每年大概 2000 多万，按照科学家的预测，假设气候变化不受控制，到了 2100 年就有 1.25 亿人成为洪灾的难民。

去年 9 月份，习主席宣布了中国在 2030 之前将实现碳达峰，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我认为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重要里程碑事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碳排放现在占到全球的 30%，我们的碳排放现在是美国和欧盟加起来的总量。如果中国不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的话，全球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即使实现了碳达峰、碳中和，甚至达到负碳，意义也不是很大。只有中国承诺了，而且能落实的话，才有可能逆转人类本世纪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气候灾难。因此我再说一遍，习主席宣布碳中和目标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巨大贡献，很可能是本世纪一个最大的贡献。

下面说一下碳中和给金融业带来的机遇。最近有几项研究，一个是解振华主任牵头的清华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他们做了一个报告，整合了 18 个机构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结论是，在今后

30 年中为了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新增 138 万亿的绿色投资，这个数字超过每年 GDP 的 2.5%。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其实不大，我和他们商量过，我认为他们这个数字太小了。部分原因是我在 2019 年就牵头给重庆市做了一个碳中和的规划，也用了很多模型来测算，今后 30 年如果重庆要实现近零排放，重庆就需要有 13 万亿的绿色低碳投资。大家知道，重庆的经济规模只有全国总量的四十分之一，而重庆的人均收入跟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可以作为中国的缩影，那么把重庆的数字乘以 40 的话，就是 500 多万亿的概念。因此，我们未来的投资区间，应该在 100 万亿到 500 万亿之间，这也是金融业一个巨大的机遇，可能比任何一个其他板块来得更大，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成长空间。

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投资需求？我们看一下图 5，这是我们在重庆报告里描述的三种不同的碳排放轨迹。一个叫参考情景，就是政策不变的情景，我们继续按照原来高碳和粗放的路径来发展经济，那么在今后 40 年中，我们的碳排放持续不断

的大幅度上升。中间叫达峰情景，就是在今后的时间争取达峰，达峰以后不采取新的措施，到了 2050 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保持一个基本稳定而已。只有在近零排放的情景中，我们才会看到碳排放有大幅度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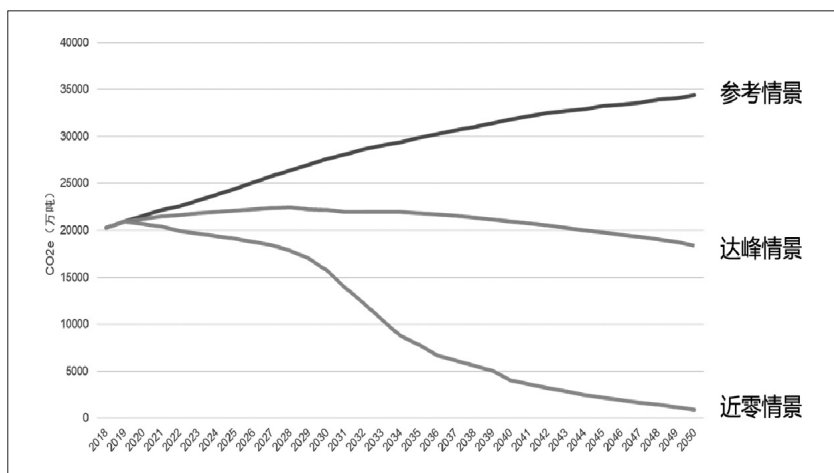


图 5：碳中和（净零）路径与基准路径的巨大差别

参考情景和近零情景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大量的投资。至少分成两类，第一类投资是把现有的低碳零碳技术进行广泛的应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已经有了一个零碳建筑，只有一栋零碳建筑，但是这个建筑就证明了现有的零碳技术在建筑业中是可行

的。技术可以把这栋楼的能耗下降 80%，剩下 20% 的能耗用四块光伏板就解决了，把一个旧楼改造成零碳建筑的成本只有 1000 块钱 1 平米，在我们沿海大城市里完全有足够的经济性。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广泛的应用，运用到每一栋楼就需要大量的投资。第一类投资，是研发和完善更多的绿色低碳和零碳技术。很多技术已经有技术可行性了，但是还没有经济可行性，一些跟储能和海上风能相关的技术还需要大量持续的投资，才能有真正的经济性。这两个领域，一个是广泛应用现有的零散技术，另一个是进一步开发新的更有商业化前景的零碳技术，就需要大量的投资。

那么这些投资会去到哪些领域呢？主要是五大领域，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和林业，这五大领域基本上占到未来绿色投资的 90% 左右。能源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板块了。最近清华的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测，认为到 2045 年，中国的电力结构中 95% 是可再生能源，只有 5% 是煤电加上碳捕捉，没有碳捕捉的煤电是不能用的。这就意味着未来 25 年中，我们的能源结构，尤其是电力结

构，会进入一个巨大的、原来不可想象的转型，而且要比其他行业的零碳化或碳中和来得早，要早 10 到 15 年，为什么呢？因为能源必须要先零碳化，才能给到其他行业足够的时间，让它们达到碳中和。比如说建筑要碳中和，一定要先有绿电；工业也是这样，要碳中和必须要先有绿电；交通要碳中和，也得先有绿电，而且要给一段时间，让它在绿电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设施，推广生产和消费。所以能源的零碳化，恐怕只有 25 年的时间，因此速度会非常快。4 个月以前，风能协会的预测，未来五年光伏和风能的新装机每年就会超过 100GW，和上一个五年相比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有望翻番，现在看来还会超过这个预测。

交通运输领域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汽车的电动化，尤其是小汽车，基本上都要实现完全的电动化。海南已经宣布了 10 年之内，就得全部是电动车，未来的燃油车在十年之内就要被淘汰，我想很多中国别的城市，也会纷纷宣布类似的政策。虽然上海没有宣布这个政策，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第二辆车的话，不要买燃油车，否则你还没有

用到车的寿命，就不让上街了。除了乘用车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交通工具也需要走向近零，现在从技术角度看，公交车和重卡用氢能的可能性比较大，飞机和船运未来也可能以氢能为主。氢能作为一个储能方式，现在被各方所看好，有一些预测认为未来的清洁能源，恐怕是三足鼎立：光伏、风能和氢能。有光和风的时候，用光和风作为主要的能源；没有光和风的时候呢，把氢能释放出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调峰措施。



图 6：北京的零碳示范建筑

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说绿色建筑，现在更多讲零碳建筑。上个礼拜，北京的中国绿色建筑研究院

开了一个会，现在正式已经启动了中国零碳建筑标准的编制小组，我也是这个编制小组的顾问。未来不光要搞 20% 到 30% 减碳的绿色建筑，更多要搞零碳建筑，像图 6 中后面这个楼一样，这是北京的第一栋零碳建筑，我在这个照片里是右边第二个穿白衬衫，我左边那位这个楼的设计师。他告诉我，用了几种办法，他们就能把这栋大楼的能耗降低 80%。大楼里的灯基本上是不用电的，从哪来的光呢？从房顶上的太阳光，通过折射，传导到下面几层。窗户都做了改造，可以大量节省能量。



图 7：四块光伏板

剩下 20% 的用能怎么办呢？用四块光伏板，大家看图 7，一辆汽车上有四块黑黑的光伏板，可以解决用电的问题。所以，花了每平方米大概 1 千块钱左右的改造成本，就可以把建筑改造成一个零碳的建筑，所以有大规模的推广潜力。



图 8: 绿色建筑中将更多包括零碳建筑

欧洲有了很多零碳的示范园区，图 8 是在柏林边上的一个 EUREF 零碳示范园区，园区中所有的建筑物、所有的交通运输设施和所有的电力设施，完全已经做到零碳，而且不需要政府补贴，每个项目都有经济性。这样的零碳示范园区，现在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现在接触到

的重庆两个区想做零碳示范园区，浙江也有，上海也有，福建也有，现在全国各地可能涌现出一大批类似 EUREF 的零碳示范园区。

我们再讲讲气候相关的风险。前面讲到机遇，但是风险一样很大。气候相关风险分成两类，一类叫做物理风险，一类叫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指的是海平面上升、台风、飓风、热浪、干旱等，所带来的对物业、资产的破坏。这些问题在全世界不承诺碳中和的背景下，会变得非常严重。如果大家都不搞碳中和，都继续不断排碳，未来温度上升可能就不是 1.5 度 2 度的问题，可能变成 3 度 4 度 5 度 6 度，到那个时候刚才讲的那些物理风险都会变成现实。这种风险在全球主要国家都承诺了碳中和的背景之下，就变得比较小。我们在 30 到 40 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国家变成零碳，因此海平面上升也不会太高，这些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也不会上升太大，所以物理风险将会得到控制。而转型风险，就会明显放大，因为我们只有 30 到 40 年的时间，要把所有高碳的产业和所有高碳的企业清零。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高碳的企业，不管你是在

化石能源行业，像煤炭、石油、天然气，或者是在制造业的钢铁、水泥、铝业、造纸等等，都是高碳能行业，只要你不减碳，几十年当中你就必须要出局，这家企业的价值就会变成零，企业的贷款就可能变成坏账，你在企业中持有的股份价值也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金融风险。而且是直接显示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巨大金融风险。

关于这些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其实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物理风险可以转化为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举个简单的例子，海平面上升，把你的房子淹了，如果你的房子有按揭，它可能变成坏账，这是一个信用风险。如果你在这个房子里股权投资的话，淹掉以后，房子的价值大幅度下降，这是市场风险。转型风险有很多，它可能来自政府的政策，也可能来自一些技术的变化。比如新能源的成本，由于技术革新、税、罚款，相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替代了化石能源的产品，导致高碳企业的盈利下降，成本上升，最后出现违约的风险和估值下降的风险。去年9月，NGFS（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在我的牵头下，我们

工作组发行了两份文件，《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和《ERA 方法案例集》，总结了 30 多个研究案例，这个案例集是一份长达 600 页的报告，囊括了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已经被采用的、在银行资管保险中用于分析环境的气候因素如何转化为金融风险的方法和工具。

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有些国家的央行和一些研究机构与金融机构所做的环境风险分析结论。比如荷兰央行测算，本国银行中有 11% 的资产面临比较大的气候风险，其中就包括刚才讲的化石能源的资产和高碳制造业资产。法国央行说他们国家的银行保险有 8000 多亿欧元的资产面临转型的风险。英国的一家研究咨询机构计算，在碳中和背景之下，煤炭板块估值可能下降 80%，石油和天然气下降 40%，水泥会下降 30%，但是新能源的设备公司估值可能上升 60%。欧洲 2ii 研究所分析了在碳中和背景下资产价值与对应的银行违约率问题，预计煤电会减值 80%，煤电相关贷款违约率会提高 4 倍。

我在清华创立的清华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也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转型风险的研究模型。这里我们展示一个案例，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煤电企业贷款的违约率会由于转型因素而上升到什么水平。我们考虑了五大转型因素，第一大因素是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新能源的需求会上升，煤电的需求会下降，所以导致煤电企业营业收入的下降。第二，因为新能源成本在不断下降，过去十年已经降了80%多，未来十年还会降到煤电价格的一半以下，所以煤电价格会被迫下降，否则卖不出去，营业收入也会下降。第三，碳价格上升，按照世界银行的估测，未来十年碳价格应该要上升10倍，火电企业如果不能努力减排，就必须要用更高的价格去买配额，也会提高成本。第四，因为刚才讲的所有的因素都会使这些煤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银行给它们的评级会下降，债券市场的评级也会下降，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最后，有些银行已经开始研究要提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金融监管部门包括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也在开始研究要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棕色资产风险权重，如果确实引入了这样的政策，未来的煤电的融资成本还会进一步提高。

我们把刚才的五大因素都放进了预测煤电企业贷款违约率的模型里，用中国三大上市的以煤电为主的企业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是这样：第一，如果把刚才讲的五个因素全部纳入到模型中去的话，未来十年中，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会从现在的 3% 左右上升到 2030 年的 22% 左右。注意，22% 是当年的违约概率，不是指十年累计的违约概率，十年累计违约概率要比 22% 高很多。所以结论很明显，就是不能再给煤电企业贷款了，否则银行会持有一大堆坏账。第二，仅仅由于新能源价格竞争和融资成本因素，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 2020 年的 3% 左右上升至 2030 年的 12% 左右。第三，仅仅由于碳价上升和融资成本因素，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 2020 年的 3% 左右上升到 2030 年的 11% 左右。基于这种风险的判断，全球已经有 100 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公开宣布限制煤电投资贷款，包括亚投行金立群行长最近也在公开场合讲，亚投行不再给煤电企业贷款。

下面讲讲监管部门如何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

更好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我年初写了一篇 1 万多字的报告，给监管部门提了很多条如何以碳中和为目标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议。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说几个重点的建议。

第一，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修订绿色金融界定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过去我们已经有了三套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一个叫绿色金融信贷标准，一个叫绿色债券标准，绿债标准是 2015 年我来牵头主持起草的，还有一个是 2019 年绿色产业目录。目录中还包括清洁煤的化石能源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记得 2013、2014、2015 年，中国的雾霾非常严重，尤其是北方，那时候环境政策的重点就是治理空气污染，治理雾霾。所有可以治理雾霾，但是同时可能有其他副作用的项目，都会被放进去作为绿色项目来支持。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在过去的六七年中，雾霾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以北京为例，2013 年平均 PM2.5 的指数是 90，去年已经降到了 38，而环保部给 2030 年制定的目标是 35，所以离雾霾治理

的要求相差不多了。同时碳中和成为绿色发展和文明建设最主要的目标，我们的重点在变化，碳中和作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不能被损害。所以如果有一个项目，一方面虽然减轻了空气污染，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但是另一方面会增加碳排放，这样的项目不能被放进绿色项目。这种项目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清洁煤项目，因为虽然清洁煤项目能够脱硫脱硝，但是不能减碳。如果大量采用清洁煤项目，反而会增加碳的排放。因此在未来的修订中，要把这类高碳的项目从绿色产业目录、绿色信贷标准和绿色债券的支持目录里去掉。新版的绿债目录很快就会正式公布，其中已经剔除了清洁煤。但是其他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还没有做相应的调整，目前这些标准不完全符合 30/60 的要求。

第二，要求金融机构开展跟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过去我们也有一些信息披露的要求，主要是针对银行，但是银行披露的是绿色信贷的余额和绿色信贷带来的环境效益，包括减了多少硫，减了多少氮氧化物，减了多少污水等等，没有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贷款所产生的碳排放。这种信息未来会变得越

来越重要，如果作为一家银行不计算和披露碳相关的信息，就无法做到碳中和。我们建议：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要求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对高碳资产的敞口进行计算，并且要披露贷款支持项目的碳排放、碳足迹，也要求资管公司提供其投资所支持项目的碳排放和碳足迹。

第三，监管机构应该明确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ERA），强化能力建设。若干年后，应考虑将 ERA 变为强制性的监管要求和披露要求。像我前面讲到的案例一样，他们必须要有能力来分析自己的棕色资产风险的敞口，这些敞口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变成坏账，什么情况下会有很大估值的下降。

第四，建议强化对低碳投融资激励机制。过去也有一些激励机制，叫绿色再贷款，绿色 MPA 啊，也在地方层面做了一些担保、贴息等机制，但是总体来讲，力度不够大，覆盖面不够广。我的建议是：人行设立较大规模的支持低碳项目的再贷款机制（每年数千亿级别）；将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将银行资产的碳

足迹纳入 MPA 或绿色银行考核；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高碳资产风险权重；外汇管局和主权基金开展 ESG 投资。

最后我想讲讲金融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做点什么使自己变得更加绿色。作为一家绿色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有比较绿色的公司治理。所谓公司治理指董事会里要有专门的董事负责 ESG 方面的事务，应该要设立专门的 ESG 专业委员会，公司要有专门负责“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或 ESG”的部门来负责制订公司的 ESG 相关战略、政策、流程和管理相应的 ESG 风险。

第二，要有量化的战略目标，不是一些简单定性的目标，这些量化目标一旦提出来以后，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强的倒逼机制，促进配制资源给到更多的绿色活动，同时减少污染性高碳的活动。具体什么样的量化目标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有的金融机构会说，“未来五年中，我要提供 5000 亿美元的绿色或可持续的投资”、“三年之内，我把高污染高排放的投资和贷款降低多少”，或者“三年之内，我要退出煤电的投资和煤电的贷款”。

第三，政策是用来落实刚才讲的这些战略目标的。所以在某些行业当中，必须要拿出更多的资源，包括用更多的资本金来支持，像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等产业的贷款和融资。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来开发某些领域中的金融产品，比如如何支持绿色消费的金融产品。在其他领域，要管住风险敞口，尤其化石能源、高污染行业。最后，对那些存量的高风险贷款和投资，要进行严格的贷后投后的管理。

第四，作为金融机构还必须要有跟 ESG 相适应的流程。这些流程是给比较基层的员工用的，即使不理解碳中和的伟大意义，也需要在金融机构内部的流程当中，使员工行为与公司目标相一致。以绿色信贷为例，在贷前必须要对客户和项目进行 ESG 评估，不仅仅是财务的评估，还要进行 ESG 的尽调，要有定量的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对客户进行绿色的贴标，对项目也进行绿色的贴标。这些贴标有时候不是一个颜色，绿色可以有多个层次，可以深绿、浅绿、嫩绿等。根据绿的不同程度，进行对绿色信贷的定价。这些定价模型已经在

很多地方开发出来了，不是拍脑袋决定一个绿色项目应该降多少基点，而是靠一个模型进行绿色程度与信用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然后根据这个模型的相关分析，来决定最优的绿色贷款的定价。最后，贷后要进行对客户和项目的持续的环境表现和监测，不要让客户拿了绿色的钱不干绿色的事。

第五，环境信息披露也是未来金融机构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披露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讲到了，金融机构要披露它的碳足迹，包括股权的投资所支持项目的碳足迹，或贷款所支持项目的碳足迹。我们的银行一般都会披露绿色资产的余额和敞口，但是我们还没有国内的金融机构披露棕色资产的敞口，在国际上是有的，比如 HSBC，就报出来“棕色资产总量占到全部资产的比重是 20.6%”。

为什么要披露这个东西呢？因为这是管理风险的一个起点，如果连棕色资产敞口都不知道，不可能有效管理这些棕色资产未来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兴业银行做了对自身碳排放的计算和披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金融机构未来都要宣布自身的碳中和路径，所以必须要知道现在的碳排放是多

少，才能确定几年之内可以做到零碳排放。

当然，还有绿色金融产品的放行，这里面的内容非常多，比如与碳足迹挂钩的贷款、能效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蓝色债券、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绿色建筑保险、光伏风电保险、绿色设备保险等；绿色供应链融资；低碳（零碳）发展基金、绿色科技基金、林业发展基金；优化升级碳市场，将控排范围扩展到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重点行业，开发林业碳汇等。如果每一点都详细展开，半个小时也讲不完，时间关系，我只举两个例子，与碳足迹挂钩的贷款和与碳足迹挂钩的债券。这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流行的，未来在中国肯定也会流行绿色金融的产品，是能够直接支持碳减排的。什么叫和碳足迹挂钩的贷款呢？这个贷款所支持的项目，如果碳足迹降得比预期快的话，利率就可以下降，如果碳足迹没有明显下降反而上升的话，利率会上升，这个利率是和贷款所支持项目碳足迹的实际表现是挂钩的，因此是浮动的关系。这种贷款可以在整个期限中，每天都给业主施加一个压力，只要他努力减碳，就有望不断降低融资成本，债券完

全可以利用同样的设计。

数字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要把绿色金融从我们传统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扩展到绿色农业、绿色消费，支持绿色小微企业，因为农业消费和小微企业的绿色活动都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即使可能界定，成本尤其是识别和铁标的成本也会非常高。所以未来一定要用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微信数据采集、AI 技术，包括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数据的储存和交易，这样才能解决刚才讲的那些领域中绿色金融的难点和痛点。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项目不一定在短期内有很好的盈利性，但是又有很好的环境效应，所以还是要做。怎么做呢？需要充分利用一些激励机制，包括来自于中央的，像央行的绿色再贷款、再贴现，政府的担保贴息和股权投资，也用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给的软贷款，也要用一些公益的资金，在国外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给一些资金作为贴息、担保等，来帮助项目的设计。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来让那些不太赚钱的绿色低碳项目可以获得融资，就是把公益性的

绿色项目和非公益性的非常赚钱的项目，尤其是房地产项目进行绑定，把一组项目给到投资者或开发商，从而使这些不太赚钱的绿色项目能够获得部分融资。

最后讲一个在国内比较新的做法，叫金融机构自身运营的碳中和。在中资金融机构中，海通国际应该是第一家，去年年底正式宣布了要在 2025 年把自身运营实现碳中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大楼和我的员工出差，所产生的碳排放要归零，如果归不到零，就要想别的办法把它中和掉。怎么归零呢？比如改造大楼变成节能的，剩下的电力全部用绿电，鼓励员工少出差，更多用视频会议替代飞行。如果这些办法都用到了，还做不到碳中和的话，可以到碳市场买碳汇，也可以自己掏钱去种树。国际上有 30 多家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了自身运营碳中和。HCBC 就是一个例子，首先界定自身碳中和的范围，包括银行的建筑物和交通工具，以及海外机构、控股机构的碳排放，加上公务出差中乘用的公用交通工具带来的碳排放，包括贷款和投资所产生的碳排放。在这个界定范围之内做

测算，而且想了很多办法，类似于刚才讲的海通的一些办法来进行碳减排，如果不能完全达到碳减排的目标的话，就用购买碳汇等方式中和。最后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碳排放碳中和的数据要得到第三方独立的审计，才能保持公信力。

这是我们中国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公众号，从2015年就开始做了，现在每天都有和碳中和相关消息、案例、国际经验的共享等等，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就讲到这里，咱们再花一点时间做一些互动。



图 9：中国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公众号

乔依德：首先非常感谢马骏老师非常系统地讲了为什么要碳中和，以及怎么达到碳中和。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先提两个问题。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诺的是不是太多，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因为投资在绿色方面，其他方面的投资可能就会少，会不会影响我们经济增长？我听到有不少人有这个疑问。

马骏：这个问题确实有巨大争议，有些人的观点是，碳中和反而可以加快经济增长，也有些人很担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是我觉得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结论非常不一样。我们初步做了一些分析，哪些情况下，它对经济增长是肯定有好处的。比如说，如果地区研发能力很强，有能力可以成为一些重要的零碳低碳技术的发明所在地和主要企业所在地，那就会获得全球的市场份额。其实在零碳低碳技术中，今后可能有几千项几百万项，很多项都有像 5G 这样大的全球市场，甚至有垄断的意义。想象一下，如果变成了这么一个企业的话，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假设这个市或省有

一批这样的企业，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提升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可能就很麻烦，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只有煤炭，如果未来煤炭变成零了，会不会变成一个空城、死城？完全有这个可能，就看转型的能力有多强了。

还有一个角度来判断，在能源领域中是进口国还是进出口国？中国在石油领域是净进口，75%的石油依赖进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利于中国的，因为我们未来如果实现碳中和的话，就不需要进口石油了，完全用本地光伏风电氢能源替代了，从减少进口依赖这个角度，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投资能不能拉动经济？其实我们刚才说很多投资的数字，包括解振华讲的100多万亿，还有重庆的十几万亿，都是一个新增的概念。我们已经刨去了将要萎缩的那些行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总体来讲，如果要想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总的投资比不在碳中和轨迹上的参考投资轨迹来的更高，因此是有利于拉动经济的。当然假设是有一个合适的杠杆率，比如说一部分是债券融资，一部分是股权融资，而且杠杆能够控制住

的话，对整体的经济增长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陈伟恕：刚才马骏教授的报告非常好，很有启发。我想到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马教授。第一，碳中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社会、国家遇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就业题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碳中和目标交织，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互相影响将产生什么样的局面？你提出这个很前沿、很专业的问题，必然牵涉到其他方面，这是我提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主张全球命运共同体，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贸易、交往以及很多责任和义务，甚至是迫不得已要对付的很多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又会增加我们多少投资？这两个问题，总的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系统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我们人民银行的角度，怎样与其他领域协调，我想请教一下。

马骏：谢谢陈老师，提了两个非常重大，也极度复杂的问题，很多事不是人民银行可以完全牵头和协调的。这些事只有在习主席的层面才能够协调好。我简单讲我的观点。你讲的第一个问题是碳中

和与国家安全、就业、生活质量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都有关系，而且非常密切。就业方面呢，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数据可以证明，如果煤电被清洁能源所替代的话，就业反而会增加，因为煤电的用户非常少，而光伏和风电在整个产业链的劳动密集程度比煤电行业高。第二，讲到生活质量的问题，碳排放的下降可以降低很多其他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往往是同源的，居民在烧煤的同时也会产生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如果能够把碳排放降到零，空气污染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它本身是对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此外，由于降低了碳排放，生物多样性也将有所改善。植树造林是降碳排放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森林、植被覆盖面积扩大后，将有助于生物多样化，物种生存的环境明显改善，也会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国家安全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与碳中和相关，即我们的能源安全，在实现了碳中和之后，我国的能源将可以完全自给，不需要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可以增加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更复杂了。如你

所说，如果我国承诺了碳中和，但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承诺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需要帮他们去做这个事？中国承诺了以后，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趋向，很多国家在很快跟进。中国一承诺，就给人家造成压力和动力，韩国和日本在一个月之后就承诺了，也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如果中美两国都承诺了，很多别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必然会跟进，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必然。最近，有四五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宣布不再搞煤电，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所以中国宣布碳中和，有一个道义上的引领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如果他国不跟进，中国要帮他们支付相关成本。我认为这充分地显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导力，而不是仅仅花钱买别人支持的问题。

文春艳：最近有不少研究指出，中国可以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拥有的债权，以绿色债务转换的方式参与主权债务处置，您认为这样做的前景和困难是什么？

马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建议提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借钱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

国家如果出现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况，在免除债务的同时，能不能要求这些国家对生物多样性或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我们为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个建议从理论角度来看有一定的意义，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因为债务违约国之所以赖帐，就是因为其没有钱，在这一情形下再强迫其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并不可行。所以现在研究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即在形成新的债务过程中，能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要求。还有一个思路，中国历史上不太愿意直接给发展中国家规定一些附加条件，我们也可以考虑把我们的债权交给国际的平台，由他们统一的去处置这些债权的减免。如果有这么一个统一的国际平台，由其来施加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这一方式非常值得讨论。

乔依德：聊天室有一个问题，请问金融机构有成熟的指标测算自己的碳足迹吗？

马骏：国外已经有很多这类的指标了，我刚才讲了 30 多家金融机构都已宣布了自身运营的碳中和情况，其中一些机构已经测算了十几年，每年都

测，这个其实不难。我所在的北京绿色金融研究院，也在提供方法帮助一些机构进行能力建设，例如对碳中和的测算。海通作为国内第一家自身运营碳中和的机构，包括另外几家金融机构，都已经有了相关的方法知道现在碳排放是多少，也知道五年、十年以后大致是多少。

乔依德：聊天室有人问，对碳排放进行审计的过程中，舞弊的风险会不会很大？

马骏：这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是一样的，他们的资质和可信度是最重要的。你讲的问题是指并非机构本身造假，而是审计方在造假。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可能，咱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我认为应该开始考虑如何防范这样的风险。如果未来碳排放的相关审计有很大市场的话，这些审计机构应当需要有资质，这个资质可能会形成有效的机制来规范他们。

赵广彬：您刚才说中国占全球碳排放的三分之一，其他碳排放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些国家能否像中国一样，未来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马骏：中国排第一，第二是美国，第三是欧盟，

美国和欧盟加起来占比为 30%，所以中国、美国、欧盟之和占总比重应该是 60% 多一点。其他部分散布在别的国家中。

乔依德：中国有大规模的出口，我们如何应对国外碳关税对我们的影响？

马骏：这个问题现在各方面都在研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也特别欢迎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官方的意见，我个人初步的感觉，咱们有些话对内讲，有些话对外讲。对内讲什么呢？如果欧盟已经决定要实行边界调节税，即对进口的高碳产品征税，国内怎么办？我认为有以下几件事是值得我们努力的。第一，我们要强化国内碳市场的机制，尽快把碳市场覆盖范围从电力扩大到其他的高碳领域。第二，对中小企业开征碳税。第三，强化我国出口企业的碳减排措施。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尽快降下来，减少他国对我们的征税。或者把这些税留在国内，比如我们征了碳税，自然就会使得高碳企业被迫做出减排行为，使其为了降税而减排，把碳税收入留在国内，我们可以用来干别的事情。否

则，这笔税收将不可避免的被别人收走。这是第一点，当已知别人一定会对我国征税，我们自己要赶紧行动起来，要自己征自己的税。

第二，如果一些国家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征税，咱们怎么跟他谈？我们应该考虑征收碳税对全球的影响，不仅仅是考虑对自己的影响，碳税将影响全球的收入分配，我们需要做一个考量。我有一个想法，在国际谈判中是不是应该提出，如果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了碳边界调节税，应当把一部分税收收入返还给发展中国家，由发展中国家自主进行节能减排的工作。

吴建刚：您刚才讲到，重庆进行碳中和需要投资十几万亿，这一进程将在什么时间段实施呢。

马骏：从 2020 年到 2050 年这 30 年中实施。

乔依德：如果没有问题，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最近我看到一个说法，我们中国 30% 碳排放是增量。如果仅谈论增量好像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因为发达国家过去在 100 年中产生了更多的碳排放，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共同但有区别的政策，但是怎么和你刚才讲的我们自己要实现碳中和调和

起来？

马骏：共同但有区别是过去的老话，现在已经不太讲了。原来共同但有区别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认为是不想进行承诺的托词，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反复用的手段。特别是有区别这个概念，如果永远拿这个理由说话，那么本世纪就没有希望有进展。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承诺 2060 实现既定目标，具体来说承诺 1.5 度的目标。原来试图在 2050 年至 2060 年间，发达国家承诺碳中和达到 1.5 度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在 2070 年完成相同的承诺。但是中国决定 2060 年完成 1.5 度的承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此，原来用来作为抵挡发达国家压力的筹码，共同但有区别已经不再使用了，这是我的理解。

乔依德：你也知道，美国特使凯利访问中国，最后发表了一份中美共同声明，你个人对这个声明有怎样的评价？

马骏：总体上还是很积极的。前一段我们也听说美国不太情愿在气候变化上和中国有广泛的合作。美国部分的考虑是，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到很

多高科技产品，一旦高科技领域有全面的合作的话，担心中国会在这些领域中很快占领先机，甚至变成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从这次发表声明的调子来讲，美国完全回避了这方面的冲突。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在某些领域中，像氢能等，可能未来的合作是非常坎坷的，不会像中欧之间的合作这么顺利。

乔依德：我们一直提出，希望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最初不是 20 亿美元吗？但是发达国家也没有拿出来。这次共同声明中也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是不是？

马骏：这个事情在 2016 年以后，大家基本上都不谈了。当年我在主持 G20 绿色金融小组工作会议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气候金融小组，这个气候金融小组一年所有的时间都在谈这个事，就是要求发达国家落实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100 亿美元的事，其实已经谈了 10 年。最后人家就顾左右而言其他了，搞了一大堆计算方法，例如把发达国家支持私营部门给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全部算进去。后来发现谈了这么多年，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小组就取

消掉了。

乔依德：时间不早了，我最后就问两个问题。第一，可不可以讨论人均碳标准？第二，碳中和的实施，对我国的煤炭、钢铁等耗能产业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企业会面临大范围的经营和信用违约吗？

马骏：要不要继续强调共同但区别的责任、人均碳标准等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意义了。当时之所以谈这些问题，是因为不想承诺碳中和，现在都已经承诺了，而且承诺得比较积极。所以这些问题作为不想承诺的理由，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关于钢铁煤炭行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们在努力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很多坏账，并造成很多失业，关键是如何转型的问题。在中国，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大型的煤炭煤电企业，基本上都在大型集团公司里，内部有比较强的消化能力。比如，我国的五大电力公司，还有一些大的能源公司，里面都有大量的新能源产业，所以它有可能实现内部消化，不会像其他国家的一些企业完全是高碳能企业，一点清洁绿色的东西都没有，这种独立的企业

更容易出现整体的倒闭、失业和赖账。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同时辅之以很多政策，包括现在正在研究的转型金融政策，尝试通过金融支持，让原来高碳的企业尽快获得新的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帮助其转型为绿色低碳企业。

乔依德：好的，时间不早了，非常感谢马骏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马老师做了耐心全面详细的解答，也感谢大家提了很多很不错的问题。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关于碳中和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整个事情确实非常复杂，包括技术上的，包括地缘政治的，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事。我们再次对马骏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参加今天的视频沙龙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